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新华文化

源

2024年·第6期·总期: 172 + S\$5.00



淘尽沙砾始见金

青年艺术家吴锦宏

- ◈ 新加坡早年的酒楼华乐文化
- ◈ 理性王国 诗意飞扬——廖建裕专访
- ◈ 檳城新江邱氏与星洲邱菽园
- ◈ 百年长堤的昨日今生
- ◈ 张森林：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新华文化”专题完结篇

春到河畔

River Hongbao



滨海湾花园
@ Gardens by the Bay
27.1.2025 - 5.2.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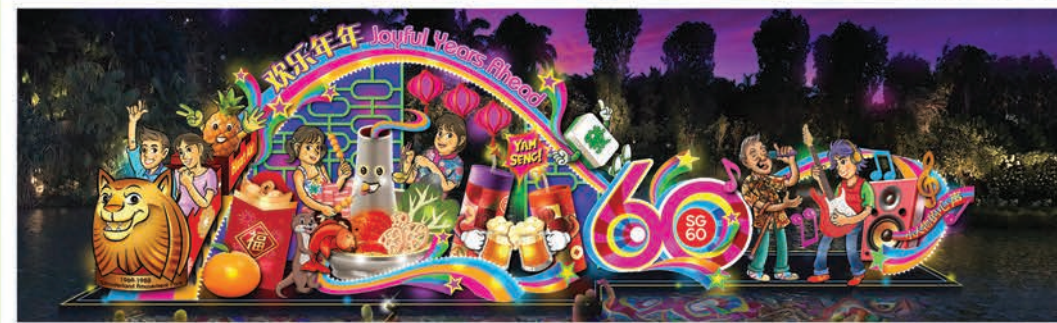
活动亮点 Highlights

- 大型新春灯饰 Dazzling Giant Lanterns
- 精彩舞台表演 Stage Performances
- 侨批报平安展览 Chinese Remittance Letters Exhibition
- 美食街 Food Street
- 游乐嘉年华 Amusement Rides

入场免费
Free Admission
www.riverhongbao.sg

@RiverHongbaoSG

@riverhongbao



Organisers
主办方: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华文媒体集团
Chinese Media Group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People's Association

Supported By
支持机构: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Media Partner
媒体伙伴: 联合早报

新明日报

UFM 100.3

963好

Venue Partner
场地伙伴: Gardens by the Bay

Gardens by the Bay

Event Management
活动策划: GP99 Associates

GP99 Associates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3年底，本刊特别推出“新华文化”专栏，探讨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何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至今，我们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他们从自己的研究方向、专业范畴、学术领域、工作及生活环境等视角来谈这个话题；文章凝结了他们对该课题的专业观点和认知，以及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由于本刊篇幅有限，不可能要求作者建立严谨的理论框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述。比如：要科学地定义“新加坡华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其上位概念——新加坡文化乃至中华文化。还会涉及到其“同位”概念：新加坡马来族文化、印度族文化、欧亚裔文化，以及若干下位概念：新加坡华族语言、民俗、艺术、文学……

我们深知，对这些课题的对比分析和科学考据，不是区区几千字就能容纳的；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在“新华文化”专题推出一年之际，我们就以“七彩”的最后一抹紫色：《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新华文化”专题完结篇》，画下一个“分号”。希望这七篇文章能引发思想的火花，持续照亮“新华文化”的形塑之路。

而今，新加坡华乐，已成为“新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您可知道其发端于早年的酒楼华乐文化？新加坡现代画会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画家团体，您可知道担起会长重任的是一个90后？廖建裕是研究国际政治的知名学者，您可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诗歌的作家？

新加坡是一个培育双语人才的国度，您想一睹本地15所中学的培育成果吗？在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创建25年之际，您想了解该学府在华文教育方面的建树吗？您知道邱菽园家族与檳城新江邱氏的渊源吗？

如果说“新华文化”是一个庞杂而宏大的体系，那么以上的一连串追问，所观照的，其实就如同这一体系中的无数“剖面”。要了解一个巨系统，我们也要像《切片报告》一样，从微小处、从其剖面来认知。本期的各栏目，就像“新华文化”的一个个切片。

2024年·第6期·总期：172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 总编辑 ■

谭瑞荣

■ 副主编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何秀菱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34/02/2024

■ 出版 ■

2024年12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香气氤氲的阳光 尤今
—— 虾饼和陈皮的魅力
- p 7 艺术长廊 淘尽沙砾始见金 赵宏
—— 青年艺术家吴锦宏
- 12 文坛掠影 理性王国 诗意飞扬 齐亚蓉
—— 廖建裕专访
- 16 余音缭绕 新加坡早年的酒楼华乐文化 郭永秀
- 21 百年树人 潮起扬帆展雄心 踏浪远航启新篇 罗福腾 李伟雄
—— 写在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创建二十五周年之际
- p 26 吾乡吾厝 槟城新江邱氏与星洲邱菽园 陈煜
- p 30 南洋纵横 百年长堤的昨日今生 李叶明

新加坡宗室联谊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s Associations

精诚携手 共拓新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黄循财总理兼财政部长欢迎晚宴

Welcome Dinner in Honour of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Lawrence Wong

29.11.2024





p.12 文坛掠影



p.16 余音缭绕



p.52 新华文化

- p 34** 最爱书房 **重构中的哲理** 王建刚
—— 读黄明恭医生《切片报告》
- p 36** 校园热线 **译彩纷呈 情牵岛国** 薛兰芳
- p 37** **林谋盛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王顺明
翻译: Low Yik Teng, Nicole Zhan Shugun, Cai Xiaotong
- p 41** **P. GOVINDASAMY PILLAI** Courtesy of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翻译: 黄一航、黎新宇、段禹辰
- p 44** 旧貌新颜 **阳光、大海和沙滩为伴的马林百列** 李国樑
- p 49** 宗乡文化 **好戏连场 乡音动听** 葛新
- p 52** 新华文化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 张森林
—— “新华文化”专题完结篇
- p 58** 总会专递 **精诚携手 共拓新程** 欧雅丽
—— 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办黄循财总理兼财政部长欢迎晚宴
- p 61** 仿佛风 **逃离** 陈雨婷
- p 62** 本土文学 **何曾念此** 孙志伟



香气氤氲的阳光

虾饼和陈皮的魅力



文·尤今

“阳光是有香味的。”
这是婆母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移居到南洋以前，公公和婆母在海南岛胼手胝足地从事农耕，婆母念念不忘的，是当年曝晒稻谷的莫大乐趣。

她忆述，在丰收时节，将满筐满箩肥硕的谷子拿去阳光底下晒，谷子摊开一地，金色的阳光落在上面，闪闪烁烁的，像是一地细细碎碎的金子，煞是好看。

谷子每隔两个小时必须翻动弄匀，中午的阳光如狼似虎，凶猛阴毒，大家都不爱这苦差，偏偏婆母非常享受沐浴在阳光里的那种感觉。谷子经过曝晒，会散发出一种蓬勃而又饱满的馨香，婆母陶醉地说：“我和谷子，都被晒得香香的，好不舒服啊！”

到南洋生活以后，婆母一直抗拒不用洗衣机，她认为由洗衣机烘干的衣服有着机械那一股生涩的味道，很不好闻；尤其是枕头套、被

子和床单，没有经过阳光的洗礼，躺在上面，睡不安稳，好梦逃逸。大家都觉得她每天用手搓搓洗洗，辛苦不堪，她却乐在其中。老人家的信念啊，就像榕树的根，丝毫撼动不得。

在阳光底下把衣服收回来时，她总喜滋滋地说：

“你们闻闻看，这衣服啊，吸收了阳光的香味，又绵软又清新，穿在身上，人也显得特别精神。”

每隔一段时间，她便不惮其烦地把床褥搬到屋外，让床褥美美地进行日光浴，秉性幽默的她，绘声绘影地说道：

“阳光啊，就是最好的除虫剂。只要阳光一钻入床褥，臭虫们全都逃回八千里外的老家去喽！”

大家都被她脸上自鸣得意的表情逗乐了，至于臭虫八千里外的老家究竟在哪里，没有人探究追问。

虾饼

婆母是烹饪好手，她烹制的许多食物，都巧妙地引入了阳光的香味。

每年，腊鼓频催的时候，她便会着手做那令人垂涎三尺的虾饼了。

做虾饼，功夫繁琐。事事讲求完美的婆母，把精挑细选的鲜虾去头剥壳之后，把含有膏卵的虾头滚成浓稠的汤。将虾肉反反复复地剁成细细的虾泥，在虾泥内加入虾汤和少许调味品（糖、盐、胡椒粉、蛋沫、食油等），连同木薯粉一起搅拌均匀，蒸熟。搁凉之后，置入冰格冷藏24小时。次日取出，切成薄片。婆母刀工了得，每一片都能精准地切成一厘米的厚度，从无失误，胜于机器。接着下来，就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了——日晒。

婆母把一片片薄薄的虾饼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圆圆大大的笊篱上，拿到日头底下晒。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丝毫轻忽不得。她必须确保虾饼晒得干干透透，一旦守护不严，被雨淋湿，便前功尽弃了。至于要晒多久，就得视太阳公公的脾气了。倘若它笑脸常开，晒个两三天便足够了；但是，如果乍阴乍晴，甚至刮风下雨，便得拖上一段长时间了。在曝晒虾饼这几天，婆母活得好像一只警犬，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飞扑到屋外，动作的敏捷，连年轻人也自叹弗如。婆母养了一只大白猫，被她溺宠得不成样子，好吃好住地伺候着，一天到晚懒洋洋地躺在大厅里，像一大块发酵过度的面团，有时我真担心它会被老鼠活生生地咬死哪！小姑调侃地对婆母说：“养猫千日，用在一朝；你怎么不叫那只大肥猫去守护你的虾饼呢？”婆母慢条斯理地应道：“我都养你三十多年了，也不见你帮我去守看啊！”小姑被噎得哑口无言，大家笑得前合后仰。嘿嘿，婆母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

吸饱了阳光的虾饼，干干硬硬如同一块块被削得薄薄的木片，拿在手上，弹击有声。

婆母手势温柔地把它们放入沸油里，原本紧绷着脸的虾饼，在热油里“滋滋”连声，迅速膨胀，变成了一片一片白色的花瓣，娇媚万分地卷来卷去。

虾饼一从油里捞起来，大家便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抢吃。酥酥脆脆的虾饼轻轻一咬，“喀喇”一声，金碎玉裂，虾的鲜味宛若冲出樊笼的

鸟儿一样，充满了激情，快乐地在味蕾上翱翔。慢慢地嚼食着时，平浅的甜美渐趋丰富深邃，变成了镌刻在舌头上一道绚烂的风景。

有人向婆母追讨食谱，她云淡风轻地说：

“只要虾新鲜，调味好，虾饼自然就好吃。”

其实，真正的答案藏在她内心深处：这些虾饼里，是附着阳光的灵魂的，这样一种生龙活虎的味道，当然足以勾魂摄魄呀！

知道我们一家大小都喜欢这独门虾饼，在过完春节离开怡保时，贴心的婆母总会让我提着一个装满虾饼的铁皮桶回返新加坡。

返家后，我将部分虾饼取出，分装成好几袋，分赠好友，尝过的人莫不跷起拇指频频赞好。挚友胡芸莲是个不折不扣的饕餮，每每知道我家有虾饼，便变得和颜悦色，俯首帖耳，一副千依百顺的样子，和她平时伶牙俐齿、唇枪舌战的作风有天渊之别。一见我脸上阳光明媚，她便温柔万状地说：“呃，呃，你家的虾饼，分一点来尝尝吧？”然而，虾饼一吃完，她立马原形毕露，一秒钟也等不了；我也只好一如既往地取出“无形的盾牌”自我捍卫，阻挡她语言里充满戏谑意味的刀光剑影。当然，我也不是吃素的猫，绝对不放过任何回敬的机会，如此刀来剑往，旗鼓相当，倒也不失为生活的奇趣。不过，每回一想到虾饼竟然可以充当我暂时的“和平大使”，我便忍俊不禁。

婆母把阳光注入虾饼，也同时借助阳光制作陈皮，让我再次深切地领略到阳光无穷的魅力。

橙皮

婆母闲时喜欢打打麻将消遣时光，有时，她会带去一些自制的小食让牌友分享。有一回，她捎去了蒸牛肉丸，其中一名牌友陈婆婆在品尝过后，向婆母直言，如能在牛肉丸里加入一些陈皮，风味更佳。第二天，陈婆婆就给婆母送来了一包陈皮，她自豪地说：“这陈皮是我自己晒制的，收了十多年呢！”顿了顿，又说：“一两陈皮一两黄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哪！”

从善如流的婆母，再次蒸牛肉丸时，便加入了些许剁碎的陈皮，牛肉的鲜味被陈皮激活了，香气变得犀利而奔放，着实有画龙点睛之效啊！

渐渐地，婆母发现，陈皮妙用无穷。以它入

膳，可调百味。它不但能够去除鱼类和肉类的腥膻，而且，能在食物里释放一种千回百转的迷人香气，使食物吃起来更为细致、更为鲜香、更为诱人。

眼看陈婆婆送的陈皮即将用罄，婆母决定“自力更生”。她向陈婆婆讨教，陈婆婆明确地表示，市面上出售的柑橘，全都可以用以制作陈皮，但是，要制作正宗而上好的陈皮，必须用产自广东省新会区的柑橘。由于拥有独特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优异的地理环境，新会出产的茶枝柑，果皮较薄、皮色光亮、质地上佳；最为重要的是，它有韧性，果皮在晒干后容易保持完整。此外，茶枝柑皮陈化之后，在浓郁的香气里蕴含着一丝丝甜润的回甘，口感丰富，愈久愈醇，药用价值也愈强，是制作陈皮上上之选。有人因此调侃地说：新会茶柑的价值集中在柑皮，它是为皮而生的。

陈婆婆是广东省新会人，知道婆母有兴趣学做陈皮，她嘱婆母耐心等待，等年尾在茶柑盛产季节时，她们一家子到新会省亲，就会给婆母捎回一箱茶枝柑。

终于，等到了。

对着那一大箱金黄色的茶枝柑，婆母如获至宝。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里生活，许多人为了节省功夫和时间，都用“三蒸三烘”的方式来制作陈皮——将洗净的柑皮蒸了之后，放进烘炉里烘干，如此重复三次，就将干透了的柑皮收进密封的玻璃罐里，等它慢慢陈化。

然而，陈婆婆不肯走捷径。她认为在又蒸又烘的过程中，柑的自然风味和天然香气都会受到破坏，制成的陈皮，味道寡淡，缺乏该有的鲜香感和层次感。唯有生晒的，才能把香气紧紧地锁住，而随着时间的沉淀，香气会愈加浓郁，越陈越香，入口甜润醇和。

陈婆婆坚守传统的信念，和婆母不谋而合。婆母一心认定，阳光才是制作陈皮最重要的“原料”，不曾吸收阳光精华的陈皮，犹如蜡塑。

她依照陈婆婆的指示，在水里加入小苏打和盐，将新会柑放入，浸一个小时，再以刷子一个一个仔细刷洗，把可能残留在上面的农药彻底去除。之后，拭干水分，以磨得极利的刀子在柑橘的表皮由上而下切四刀，剥皮时，必须注意保

持果皮的完整。剥开的柑皮，宛若四片美丽的花瓣。婆母剪除了多余的筋膜，再把柑皮在筐箩上一片一片地摊开，柑橘的白瓤朝上。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在万里无云的大晴日，必须连续晒上四五天；如果碰上阴天或下雨天，时间当然也就拖得更久。

丰沛的阳光源源不绝地渗入柑皮里，柑皮不动声色地接受阳光的洗礼，含蓄的香气缓慢无声地溢出。每晒一天，柑皮的颜色便浓一些，婆母脸上的笑意也深一层。渐渐地，吸饱了阳光的柑皮，变成了漂亮的深褐色，婆母的笑容比阳光还耀眼。干透了的柑皮，硬如石头，用手指敲击，嘎嘣有声。空气里，起起伏伏的，全是柑皮带着甘醇之气的呼吸。这时，婆母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每一道都镶嵌着澄亮的笑意，有着大功告成的释然与恬然。

当暮色吞噬了满天绚烂的华彩时，她不啻拱璧地把几筐箩脆生生的柑皮收进屋里，一片一片小心翼翼地放进阔口圆肚的玻璃瓶内，密封，在瓶口上标明日期。在灯光下的映照下，柑皮瑰丽的纹理如星河般璀璨。

柑皮必须经过三年以上的陈化过程，才能够成为可以入膳、入茶、入药的陈皮，所以，只能耐心地等。为了防止霉变，每年两三次，婆母还得开封，一片片地拿出来，在阳光底下曝晒。温暖的阳光，既是它们的“防腐剂”、也是它们的“维他命”。

婆母是以哺育孩子的爱心来“养”着她的陈皮的，时时关注、刻刻查看；浸在爱里的陈皮，悄悄地起着变化，颜色愈来愈深、香气愈来愈浓……三年过后，深褐色的陈皮出落得像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寸寸皆妩媚。

瓶盖一启，丝丝缕缕的香气幽幽散发，缭绕鼻端，有着一一种宁静的喧哗。

婆母大展身手，物尽其用。鱼里有陈皮、肉里有陈皮、汤里有陈皮、甜品里也有陈皮。

品尝陈皮，宛若在吃时间的年轮，那是一种很深沉的滋味，似有光影明暗递变，层次复杂，既有甘苦共存的宁静、也有苦后回甘的恬静。当然，在细细咀嚼时，我也明确地尝到了阳光氤氲的香味……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淘尽沙砾始见金

青年艺术家吴锦宏



文图 · 赵宏

对于普通人来说，画家无疑是一种光鲜亮丽的职业和身份，动辄与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艺术品直接相连，高尚而且富有，像明星一样，神秘而令人向往。然而，对大多数画家自身而言，艺术很可能是一份相当有风险的职业，谋生之路甚至比一般人更艰难。普通世人看到的大概只是少数几个幸运成功的画家，更多的画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在还不被人知的情况下，在还没有真正踏入艺术之门、没有画出伟大的作品之前，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了。志大才疏的人做不了画家，有才华却没有机会的人成不了名画家，有才有名却不能长寿的画家更是可怜的人。因

此，在绘画界，似乎一直流行着一句话：尽早出名，假如岌岌无名，就争取长寿，努力活到出名的那一天。

这似乎是过于悲观或庸俗的看法，但却有一定的道理。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事业，不是仅仅通过努力和勤劳就可以实现的。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成果，是思维精华的集中体现，是哲学、美学、意识、文化等诸多元素的集成，需要特殊的天分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及灵活超绝的表现技巧。专业的美术训练可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真正的美术成就，往往只取决于画家自身的天分与才华，还有一点神奇的、不可捉摸的运气。

年轻有为的画会会长

早期的新加坡，地处南洋偏远之地，在历史上与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都相距遥远，是文化神经的末梢。因此，在这里从事艺术就更难。人们更实际，更看重经商贸易而积累财富，或是建立实业，对似有若无，看似没什么实际用途的艺术难以重视。本地不少老画家，大都经历过长期、艰苦的等待，在接近晚年的时候才收获一部分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视与认可。因此，对于一般的艺术家来说，少年成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故事与传说。

但事情总有例外。吴锦宏 (William Goh Jin Hong, 1992-) 是本地一位年轻而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使用多种媒介创作，如油画、丙烯画、砂纸画、雕塑、素描和混合媒介作品等。不过，在他的中学时代，一位在本地美术教育界和文学界颇有声望的老师曾直言吴锦宏根本不会画画，画得一团糟。然而在2021年，不到30岁的吴锦宏，凭借作品《昨夜》，在第40届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中荣获新加坡资深画家组别的最佳表扬奖，2023年再获此奖。吴锦宏2017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获艺术教育文凭；2020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获艺术教育学士学位。自2016年起，吴锦宏参加新加坡现代画会和水彩画会，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现任现代画会会长。

新加坡本地各种画会众多，但现代画会是很有些不同寻常的。1963年，何和应 (Ho Ho Ying, 1935-2022, 2012年获文化奖)、

黄明宗 (Wee Beng Chong, 1938- , 1979年获第一届文化奖)、黄奕全 (Ng Yat Chuan)、陈贻僮 (Tan Yee Hong, 1932-2003)、郑志道 (Tay Chee Toh, 1941- , 1985年获文化奖)、董长英 (Tong Siang Eng, 1936-)、吴仲达 (Jolinda Goh) 七位青年艺术家联合发起现代画会 (Modern Art Society)。同年十月，现代画会举办第一届画展，名作家韩素音女士主持开幕。当时的新加坡社会，公众普遍可以接受反映现实生活的具象作品，现代画会所崇尚的以超前的纯粹意念、新造型与新技巧等表现手法与主题的作品非常少见，展览虽然相当轰动，但反响褒贬不一，郑志道的作品当场遭破坏。若干年后，画会主席何和应的装置作品也在一次展览中被毁。2024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为现代画会的老将张永生 (Teo Eng Seng, 1938- , 1986年获文化奖) 举办《我们快乐，你快乐吗?》的回顾展。此前张永生的作品《网 (绝对是新加坡河)》已为人所熟知，他用从新加坡河里打捞上来的破渔网和纸雕碎片完成这件装置作品，揶揄本地艺术家滥用新加坡河为创作题材，作品却不如1970年代至1980年代河里漂流的浑浊不堪的垃圾有价值。

少年自有少年狂

与很多年轻人一样，吴锦宏刚刚进入学校读书时，那些有着明确的历史痕迹的艺术名词对他来说全然没有特别意义。吴锦宏是第三代移民，祖辈来自潮州汕头，当年是抗日义勇军成员，从

《路过》布面丙烯及从巴士站收集的物品，混合媒体 150X120cm (2017)



《向外看》布面油画 110X130cm (2022)



中国逃至马来西亚，后改换姓名，落脚于新加坡武吉知马一代。1990年代，新加坡已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他的家庭仍属于低收入之列，父母做散工，生活拮据。吴锦宏入读正华小学，对美术深感兴趣，曾以一件用订书器把纸皮连起来的初级雕塑作品荣获过一次艺术比赛的奖励，也曾在知名画家邓尔昌（Teng Nee Cheong, 1951-2013）处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炭笔画。其后，他入读武吉班让政府中学（武中），依旧喜欢美术，喜欢涂涂画画。不过，他的美术科成绩一直都是同学中最差的，授课老师认为他根本不会画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顽皮与艺术探索。为了把同学变成雕塑，有一次他居然用灭火器向同学身上喷满了白色的粉末。

中学毕业后，吴锦宏入读先驱初级学院，本想主修美术学科，被校方以成绩不合格而拒绝，只好转修文学、经济等学科。一年后他再次申请转入美术科，但还是因为测试不合格而被拒绝。校方的评价是看不到他在绘画领域的才华，也没有一般的美术基础理论概念。稍感失望的他选择退学，进入义安理工学院学习商科，不久后考入南洋艺术学院，主修图像设计和美术教育。在南艺，吴锦宏终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舒展和释放，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对艺术的向往与热爱了。他像一块被捏得扁扁的、极度干燥的海绵，一下子跃进无拘无束、浩瀚无际的大海，开心地吸吮每一滴艺术的水珠。他努力且自律，每天刚过7点就来到学校，晚上快12点才迟迟离开，搭最后一班11点45分的190号巴士回家。他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雕塑、陶艺、印章、书法、水彩、油画……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来自老师的否定刻下了难以消退的印痕，吴锦宏始终非常反感任何老师对他的美术作业或创作进行批改。曾经有一位颇有名望的水彩老师在课堂上对他的习作习惯性地予以示范修改，招致他十分不快，他也丝毫不掩饰这种不予认同的态度。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一旦被人修改了，就不再是自己的，他讨厌别人删改他的原创作品。当老师满怀期待地望向他时，看到的分明是拒绝和不认同，这让老师相当不悦。

艺术是生活的写照 亦是哲思的延伸

吴锦宏对艺术不间断的热爱与执着，最终成



《日常交响曲》砂纸上砖块、塑料、泥土，混合媒体 140X170cm (2023)



《日常挂毯》砂纸上砖块、塑料、泥土，混合媒体 140X174cm (2023)

就了他。他虽然年轻，但他的获奖油画《昨夜》已经是一件非常成熟的作品。在这幅作品上，人们看到是一间平静的新加坡街角小食店和店外摆放的桌椅。画家在亚麻布上作画，流露出对传统绘画的敬仰之意。画面只用了灰色和白色两种颜料，简单调色，强调出不同灰度的变化以及明暗和阴影等视觉效果。通常，在调配灰颜色的过程中，对白色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白色使用不当，就会破坏事物本身的色相。颜色本来没有美丑之分，哪怕是特别难看的颜色，只要搭配得好，也会非常漂亮。而颜色的美是来自于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谐效果。有对比的颜色能刺激视觉神经兴奋，但只有兴奋而没有舒适也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因此，出色的画家会利用颜料的不同色调“调和”并降低颜色的对比，从而产生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

在这张画上，吴锦宏通过对色调的深入理解和高超把控，完美实现了情绪与意念的传递，同时完成对光线的准确解释，既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诗意的。而且，通过繁琐的构图和位置关系，他耐心地向观众展示了各种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彼此关联，营造不同寻常的视觉审美。一间再普通不过的街边小食店，经历了一夜热闹的人间烟火，在清晨的霞光中，周围一片静谧。干净的桌椅早已摆放整齐，画面上看不到一个人，这是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阻断措施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远处隐隐约约摩托车和巴士迅速驶过的轮胎摩擦声正在远去，似乎是一种悲壮的告别。吴锦宏的美学感受是理性、严谨、而且内敛的，他画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心中的理想，抑或是梦一般的回忆。

《昨夜》布面油画 122X91.5cm (2021)



吴锦宏非常推崇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 (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1925-1995)。德勒兹认为：传统的时空观是立足于主体的位置和运动的，纯粹的差异是非时空性的，是一种虚拟概念。德勒兹的“虚拟”是当下真实经验的前在环境条件，是事物本身的内在差异，并由此种差异关系构建了真实的空间、时间和感知。

虽然年纪很轻，但吴锦宏却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他的心里，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田园诗般的家园情节。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地表景观的变化是迅速的。吴锦宏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那些即将被拆除的组屋和邻里小镇的建筑旁。他会拾起一块旧砖、一扇浴室的木门，或者一条栏杆……于是，在吴锦宏的作品里，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逝去的家园。

吴锦宏独创了一种特别的砂纸画，与普通的在砂纸上摩擦油画棒的做法不同，他是直接把各种材料刮擦上去，留下痕迹，然后再进行固化处理。在一幅题为《日常挂毯》的混合媒体作品上，吴锦宏用在已经消失的建筑物原址捡拾的砖块、塑料片、土块在砂纸上勾勒出一个包豪斯景象的建筑剖面。他描绘的应该是新加坡常见的组屋的底层敞空部分，但在视觉上却选取了极为主观的观察和表现角度，把俯视角度的路面与纵向深度透视的建筑物结合在一个平面上，形成视觉错差。画面的底色是铁锈红色，应该是用旧红砖摩擦而成。他用大面积的、生锈的铁红色调，传递出一种陈旧、庄严、坚实、雄伟的观感。这似乎不是温暖的旧家的气息，更像是一座没落的、曾经如火如荼的炼钢工厂的旧址。

什么是画家心中的家园？在另一幅同样是在砂纸上完成的以家园为主题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高耸的组屋楼顶、穿插其间的硕大的树冠，以及横穿而过的公路。显然，在画家的心中，家是温馨的回忆，也是梦想和理想开始的地方，是一个少年想象着国家在厚重的隆隆声中雄壮地前进的样子。大多数新加坡建国一代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各种工业体系的工程师，他们是父亲，撑着家庭，同时也是国家富强，走向现代化的建设者。他们现在的样子，就像那些已经被拆除或将要被拆除的建筑的样子，正在变老，甚至倒下去。但他们在青年的心中，依旧是高大矗立的形象，是曾经炽热的火焰。吴锦宏有着艺术家的敏

感与细腻，但他流露的不是柔弱的温情，不是消沉与抑郁，而是昂扬与振奋的力量。

游笔至此，笔者想引用一段文字，来“注脚”这位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给人带来的思考：

先驱画家对马来风情现实的浪漫想象、反殖民运动中以“赤道艺术研究会”画家圈为主体的社会现实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加坡国家艺术政策转变以及第二代画家为主体的怀旧情怀和新加坡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多元化表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主义绘画在建立本土艺术流派，疾呼社会变革，直面危机和困顿，追忆和重建逝去的景观，反思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趋势则是由年轻一代艺术家所引领的。他们践行着法国现实主义代表库尔贝最早提出的创作理念即“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转译我所处时代的习俗、思想与面貌”，充分展现出一种独立的批判和探索性。地方意识、文化身份以及区域性成为近年来新加坡现实主义所关注的重要部分。在集体意识里，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里，他们成长的国家成为亚洲现代精神的代表。他们更像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注视着攀升的摩天楼和愈加恢宏的商业综合体。新加坡的画家们正思索着后李光耀时代所带来的未知以及离开南洋风格的束缚后，本地艺术家是否能够真的在当代艺术中重新开辟出一块具有辨识度和认同感的新南洋文化，而非作为全球化同质性艺术景观的一个注脚。^[1]

注释：

[1] 佚名，《新加坡现当代现实主义》，中国美术报，原文发表时间不详，此处引文节选自中国书画网。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William Goh, Creates Painting with Bricks on Sandpaper

William Goh (1992-) is a distinguished multi-disciplinary artist from Singapore, renowned for his innovative use with a wide range of media, including oil, acrylic, sandpaper and mixed media. His artistic journey began in primary school, where he was recognised with an award-winning bull sculpture made from cardboard at Sculpture Square (Current Objectifs). At the age of five, he briefly studied charcoal drawing under esteemed artist Teng Nee Cheong.

Despite facing challenges during secondary education at Bukit Panjang Government High School, where he struggled academically in art, Goh's spirited curiosity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exploration proved instrumental in his development as an artist. His playful approach to creativity was exemplified in a rather audacious incident; out of youthful curiosity, he once used a fire extinguisher to coat a classmate in white powder, transforming him into an impromptu statue.

Eventually, Goh's perseverance won him notable accolades within the art community. In 2021, he was honoured with the Ngee Ann Young Artist Award and received a Highly Commended award in the Established Artist category of the 40th UOB Painting of the Year Competition for his evocative art piece "Last Night". This artwork depicts a scene of a Singapore street food shop,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palette that explores the subtle interplay of light and shadow.

In 2023, he achieved further acclaim with his mixed media artwork "Everyday Tapestry," crafted with bricks and pigments which he collected from the sites of buildings that no longer exist on sandpaper, solidifying his practice as a contemporary Singaporean artist. His academic pursuits culminated in him graduating with a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n 2020.

Goh is a notable figure in the Singapore art scene, having held various leadership roles.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Telok Kurau Studios Management Committee from 2020 to 2022 and was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ingapore Watercolour Society from 2017 to 2022. Currently, he is President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 Singapore from 2023 to 2025. His dedication extends beyond personal artistry; he is deeply invested in foster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in the art community and nurturing emerging talents within the arts.

Goh's oeuvre is characterised by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olour and composition. The cumbersome composition and posi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painting reveal various structures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s, creating a unique visual aesthetic. The ordinary street food shop, which has just emerged from a bustling night with a myriad of sights, sounds and smells, is now bathed in the tranquil morning glow, with clean tables and chairs neatly arranged. Though no figures inhabit the scene, viewers are invited to imagine the faint sound of bicycle bells in the distance and the gentle friction of early bus tyres passing by.

Goh's aesthetic sensibility is rational, rigorous, and restrained; he paints not only his own life and ideals but also dreamlike memories that resonate deeply with the viewer. Through this nuanced approach, Goh elevates the simplicity of daily life, allowing it to resonate with profound beauty and meaning, encouraging all who encounter his work to appreciate the artistry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daily existence. Goh also believes in the agencies of an artwork and believes that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a process of familiarity and engagement with issues at large and personal response from the audience instead of the artist narrative. Goh mentioned that all his works serve as an invitation to bring audience into an intimate experience that is personal which might be very different for everyone.

理性王国 诗意飞扬

廖建裕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第三代土生华人

1941年2月21日，印尼雅加达市丹那望区。一大早，一声婴孩的啼哭回荡在一家地砖厂隔壁的住宅区上空——经营该地砖厂的廖先生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给这个排行老三的男孩取名建裕。

建裕的祖父十来岁时自福建安溪南来闯荡，祖母为土生华人（早期迁居至东南亚一带的中国移民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后代）。建裕的父亲年少时曾被送回厦门，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过几年书，长大成人后，他也娶了一位土生华人为妻，他们的孩子当属第三代土生华人。

虽然会讲华语跟流利的福建话，但廖先生从来不用华语或福建话跟孩子们沟通，他们的家庭用语是雅加达方言或印尼语。

五岁左右，未曾进过幼稚园的建裕被送入丹那望中华学校，这个自幼跟土著工人子女为伍的第三代土生华人开始接触华文。

从新华到巴中

进入丹那望中华学校之后不久，建裕即转入新巴刹中华学校（简称新华学校或新华），建裕的两个兄长及一个弟弟也就读该校。父母担心他们的华文赶不上，专门请了家教上门给他们补习。建裕很快便对华文产生了兴趣，他在书写方面的进步尤为显著。

进入高年级之后，建裕便到学校图书馆借华文书来读。除了各类民间故事、神话及童话故事，他也喜爱改编自《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的连环画。此外，他还常常自己买课外书，

《世界儿童》是他最为喜爱的读物，后来，他还写文章投稿至该刊物发表。

除了中文书刊，建裕也喜欢读印尼文故事书。每逢周末，他便到住家附近的印尼书店及小书摊浏览或购买印尼文刊物。

跟同龄学童一样，建裕也喜欢听故事。教他中国语文并给他当过班主任的何学如老师是一位讲故事高手，他常常在下课前十分钟开始给学生讲故事，每到精彩之处，下课铃声随即响起，同学们无不翘首期盼他的下一堂课。有一天，当建裕得知何老师讲的部分故事题材取自世界名著《爱的教育》时，他即刻跑去图书馆借阅，可惜晚了一步，该书已被别的同学借走。那天傍晚，他马不停蹄跑去一家华文书店买了一本回来，一口气读完之后才安然入眠。

1952年下半年，年仅11岁的建裕升入新华学校初中一年级（他跳级，在新华小学只读了五年即毕业）。

初中生建裕最为喜爱的科目当属华文与历史。此时的他在华文老师詹庆祥的影响下开始读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及中国的报道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译述印尼民间故事投稿给《世界儿童》杂志，后来，他还投稿给雅加达的《中学生》月刊。

初中三年级时，他萌生了为雅加达的左翼中文报《新报》及《生活报》投稿的念头。那年下半年，他写了一篇有关阿飞的文章，并以本名投给《新报》副刊“小新报”。1952年2月的一天，那



1955年，廖建裕(后排右三)与父母、兄弟姐妹合影

篇写阿飞的短文在《新报》刊出，次日，他在校门口附近受到几个阿飞的“警告”。建裕并未因此而放弃写作，不过他在行文之时更加谨慎。除了本名，他也开始用笔名谷衣（裕也）发表文章。

初中毕业后，建裕考进由印尼侨领司徒赞等人创办的华侨名校——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

巴中学风严谨，招考严格，加之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学生。除了注重学业成绩，该校的文艺气氛也相当浓厚。进入巴中不久，建裕即加入了校内的黑板报小组，为黑板报书写短稿。除了继续在《新报》副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跟散文，他也在《生活报》撰写杂文跟影评。

自1951年起，巴中的华侨子弟即掀起了回国升学的热潮，作为“华人”的建裕则在高中毕业后选择报考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相对于其他人的“北上”，他戏称自己“南下”。

高校岁月

1959年1月，建裕跨入南洋大学的门槛，成为该校中文系的一名学子。

甫一入校，他即开始在《大学青年》杂志上发表译作。这是由高他两届的周黎及高他一届的黄孟文负责编辑的文学刊物，建裕跟这两位后来在新华文坛大放异彩的领军人物（二者后来皆获建国以来最高荣誉之“新加坡文化奖”）结

下了不解之缘。也就在这一年，建裕的首部马华对照译作《印尼名诗选》由上海书局出版。

此时的南大学子学习马来文的热潮方兴未艾（始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精通马来文的建裕也加入了“小老师”的行列。与此同时，他还成为南大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大学论坛》马来文版的主要撰稿人。

在中文系就读一年之后，偏重理性思考的建裕毅然转入历史系，专属于他的理性王国之门徐徐打开，但文学从未离他而去。

边读书边当马来文小老师的建裕在云南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翻译及整理的马来文短篇小说、诗歌及民间故事等集结成书。

1960年，他的第一部翻译小说集《印尼短篇创作选》及三部民间故事



集《爪哇民间故事》《苏门答腊民间故事》《鸭佬民间故事》出版。他的首部散文集《印尼散记》及首部中篇童话译作《怪鸟之子》也在这一年出版。

1961年，他的民间故事集《马来亚的传说》及诗选集《凯里尔·安哇诗选》《马来新诗选》出版，这三部作品皆属译作（马华对照）。同年，他的评论集《马来新文学的独特性》出版。

1962年，他的译作《南苏拉威西民间故事》《爱情·眼泪·歌声》《西洋名诗选》及评论集《现阶段的印尼新文学运动》出版。

这一时期，他在撰文介绍马来及印尼文学的同时，不断有评介马来及印尼文学的论文，也有翻译改写的作品刊载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南方晚报》。优秀的印尼中篇小说《归来》（译作）也于这一时期在《南洋商报》连载，那些后来集结成册的民间故事集大多亦曾刊载于上述报章。可以说，此时的建裕扮演着马华文学和文化桥梁的角色。

1962年年底，获颁文学士学位的建裕离开了云南园。

1963年，建裕进入印尼大学文学院修读印尼历史。

应付学业之余，他也在雅加达的华文报《火炬报》兼职，并在母校巴中和日新中学教英文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两门科目，可说是“半工半读”。



青年时期的廖建裕（摄于1965年）

1964年，他把在南大时翻译的小说《归来》重新整理出版。次年，他应出版社的要求，把早年翻译的曾在印尼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民间故事集《蛇王子》及《鼠鹿的故事》整理出版。

1965年，建裕获印尼大学颁发的历史学硕士学位。

1967年，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赴澳洲莫那什大学研修东南亚史及西方殖民史。三年后，他获颁历史学硕士学位。也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跟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结为连理。之后，他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大学研究印尼华人社群问题，并于1967年获颁硕士学位。次年，他前往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修读博士课程，三年后获取哲学博士学位。

重返新华文坛

1975年杪，建裕回到了新加坡，受聘为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专事印尼政治、中印关系及亚细安华人研究。一年之后，他的独生女出世。

家庭及事业趋于稳定的建裕又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副业”来。事实上，回返新加坡不久，停笔八九年的他即重新开始用华文写作，重新回返新华文坛。除了在华文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及评论，他的马华翻译工作也有了新进展。

1980年，他的翻译小说《还乡》（新版《归来》）及《印尼民间故事选》（第一、第二集）相继出版。1990年，他的译作《乌士曼·阿旺诗选》出版。这是一部较完整的马来诗人的诗歌作品华文译作，该诗人在马来文坛占据重要地位。

1982年，建裕转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政治学高级讲师；1994年，他升任副教授；2000年，他荣升教授。2002年6月，年届耳顺的建裕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国大。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致巅峰。1984年，他的诗集《船民》出版；1987年，他的诗集《我不是过客》及《春天，飘落在新加坡河面》出版；1999年，他的又一部诗集《谷衣诗选》出版。

“学者诗人”，名不虚传。

为霞尚满天

离开国大之后，建裕并未停下脚步，他受聘

重返东南亚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同时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至今。此外，他还曾于1998-2002年及2006-2010年两度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2006-2013年，他担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成立于1982年的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是一个致力于文化历史研究与普及的学术团体，旨在推广亚洲、尤其东南亚华裔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成立于1995年的华裔馆则是全世界首个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的大学研究中心。退休后，建裕身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他的理性王国疆域有增无减。

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依然笔耕不辍。2004年，他把近年来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及翻译小说汇集成册，是为《谷衣文集》。

基于对诗歌的偏好，2012年末，他即萌生了出版一部本地马来族与华族双语诗选的念头，旨在通过互相介绍本地两大族群的文学作品以促进文化交流。

2015年7月，由廖建裕主编并双向翻译的马来文与华文双语诗集《新加坡：我的城市我的家园》出版。该诗集收录了马来族、华族各15位诗人的32首诗作，主题是新加坡的国家历史与认同。

2018年，建裕的诗集《永远的南大湖》出版；2022年，他的又一部诗集《狮子城》出版；同年，他的译作《新、马、印当代马来诗坛泰斗及其作品译介》出版；2023年，他的又一部译作《凯里尔·安哇尔诗歌全集》出版。

虽已八十又三，但无论作为学者还是诗人，



廖建裕部分作品

建裕的脚步依然匆忙且稳健。他穿行在自己的理性王国里，飞扬的诗意让他的天空充满了迷人的色彩。

适合送给他的，只有刘禹锡的千古名句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那晚（8月28日）前往吊唁老作家张挥时碰见文友林锦，闲谈中他告诉我廖建裕值得一写。回家上网查找对方资料后托寒川代为联络，很快便敲定了采访时间。

那天早上八时许，另一半即载送我至坐落于国大边缘地带的东南亚研究院门前。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我丝毫不敢懈怠，急急推开研究院大门落座锦鲤池边，拿起手机翻看起前一晚整理的资料来。

9点45分，匆匆而来的老教授带我步入他的办公室。11点45分，我准时离开。

虽然之前对他几近一无所知，但两个小时的采访之后，他的形象在我脑海已然鲜活而生动，这跟他思维之敏捷及思路之清晰有着直接的关联。

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译作跟他的学术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自己的创作则以诗歌为主。围绕“学者诗人”这一定位做文章之时，我的侧重点其实在他称之为“副业”的一面，加之字数有限，局限在所难免，但求不留遗憾就好。

感谢林锦！感谢寒川！

新加坡早年的 酒楼华乐文化



图文·郭永秀

为进一步了解早年新加坡华乐工作者在酒楼餐馆演奏华乐的情况，2024年伊始，我约了当年演奏笛子的杨票敬及演奏二胡、唢呐和打击乐的林明钊，演奏二胡的刘光焕茶叙。谈起当年在酒楼、餐馆演奏华乐，一些故事说起来非常精彩。

在咖啡的助兴下，大家侃侃而谈，那些曾经的岁月，似乎从冬眠的记忆中飞跃而出，使人人喜形于色，表现出对于昔日“辉煌”的一种深深的缅怀和眷恋。的确，华乐在新加坡发展到今天，能够有如此灿烂的前景，与早年这些华乐工作者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分不开。

我初三那年才刚开始学音乐，第一件乐器是口琴，第二件就是笛子了。所以，我对笛子情有独钟。除了小提琴是跟马文老师学习以外，所有

的华乐器包括二胡、扬琴、中阮、柳琴、笛子、管子、唢呐、黑管、大提琴及低音提琴等都是自学的。60年代末期我考进了人民协会华乐团，担任笛子手，那时只有十七八岁。对我来说杨票敬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因为当我开始学习吹笛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当时的国家艺术团属下的华乐团里担任笛子演奏、领奏或独奏了。

杨票敬录制唱片《鄱湖渔歌》

记得当年还有另一位笛子手叫金延之，也很有名，曾经荣获新加坡广播电台主办的“斗歌竞艺”华乐组比赛第三名，但现在已经不知所踪。杨票敬曾经在国家剧场属下华乐团所录制的一张唱片中，独奏笛子曲《鄱湖渔歌》，并由乐队伴奏。这首曲子悠扬委婉，音色柔美动人，现在已经成了绝响。

杨票敬于1950年10月10日出生在马来西亚。当年新马是一家人，可以自由移居。他小时从马来西亚移居到新加坡，不需要什么证件。但想不

到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票敬反而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票敬小时家在康乐音乐研究会附近，经常听他们演奏，耳濡目染之下爱上了音乐。他自学笛子，又参加了李伍华指导的道南校友会乐队（1963年被解散）。中学就读公教中学，参加人民行动党支部华乐队。当时的领导是二胡演奏家张镇荃，其他队员包括欧阳良荣、周亚发等。

中学毕业后，他加入国家剧场华乐团，也加入教育部属下的青年华乐团，曾多次跟着青年华乐团到英国、瑞士等地演出。1972年，杨票敬、杨秀伟、蓝营轩、杨培贤、李雪岭等代表新加坡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参与英国威尔斯国际民间音乐比赛，荣获亚军，一同参赛的合唱团荣获冠军。80年代票敬也加入湘灵音乐社。1983年湘灵音乐社参加威尔斯国际民间音乐比赛，南音演唱荣获季军，器乐组则荣获合奏组殿军。70年代中杨票敬、沈文友和林明钊也是新加坡国家舞蹈团的音乐员，曾代表国家出访国外。

1969年票敬开始到学校教导华乐。他到端蒙学校执教20多年以来，端蒙华乐团在青年节华乐比赛中荣获许多金牌，被称为金牌乐队。当年的队员有李克华、唐锦成、郭进才和谢家辉等。

票敬说，60年代末期香港电影制作公司长城和凤凰，发动许多电影明星和音乐家组成“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表演，轰动本地音乐界。当时的乐队由音乐家兼作曲家于麟领导和指挥，在国家剧场演了很多场。他们有一个小乐队，我看过他们在电视台的表演，对他们精湛的演奏甚是喜欢。例如他们的合唱团演唱《泉水湾湾》《月光光》《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非常悦耳动听；乐队演奏的乐曲《边寨之歌》《山茶花》等，也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演出对后来新加坡合唱以及华乐的发展，起到了启发和鼓励的作用。

郑思森成立“民艺中西乐队”

据票敬说，银星艺术团在演出完毕后，有一部分乐员留在新加坡。他们组织了一支乐队，受聘于本地的北京酒楼，每晚演奏和为歌曲伴奏，开启了华乐在本地酒楼餐厅演奏的先河。当时的领队兼指挥是郑思森，他成立了“民艺中西乐队”，亲自担任指挥及琵琶演奏。其他演奏者

有：三弦张复生、笛子徐秀峯、二胡晓隶、中胡乐平、钱鼓邱文彬。郑思森还录制了一张黑胶唱片，叫做《深闺梦里人》，收录了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歌曲改编成的乐曲，如《兰闺寂寂》《花儿与少年》《天涯歌女》《王昭君》《绣荷包》《月落乌啼》等。

后来郑思森接任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指挥，这是第一个由官方所组织的华乐团，开启了新加坡华乐的新篇章。这个乐团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却对新加坡华乐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团被解散以后，大批乐手进入人民协会华乐团，也就是现在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人协华乐团有段时间也请到来自香港的吴大江担任客卿指挥，后来更与他签约，把人协华乐团职业化，成为本地第一个专业华乐团。其实吴大江在成为人协华乐团指挥之前，也曾在本地的酒楼演奏华乐。

在酒楼演奏使华乐深入民间

在酒楼演奏华乐，现代人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深入民间，才能让更多人欣赏到音乐的美，从而喜欢它、学习它和演奏它。但当时的社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认为他们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作伴奏，就是侮辱了华乐。他们忽略了这些华乐工作者也是人，也需要安定的收入和生活。为了自己的兴趣和生活，这批华乐爱好者不得不在众人不屑的眼光中走出自己的路。

在酒楼演奏，有时为了增加收入，一天可以跑几个地方。例如中午1-2点，可能在香妃楼；下午3-7点到繁华世界舞厅或翠华楼；晚上8-10点是酒楼宴会时间，可能在香妃楼或者翠华楼；晚上11点还可以到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Hotel Machinta表演。他参加过好多个酒楼乐队，如喜洋洋、万年红、幸福年，也为许多著名歌星如姚苏蓉、姚玮、白沙、金银姬等伴奏过。

回忆起在香妃楼演奏华乐，票敬说当年驻唱的著名歌星，有来自香港的姚玮、来自台湾的阳光合唱团（纯男声），本地有梨川、阎荷婷、阎莉婷姐妹等。票敬则担任笛子、笙、萨色风等乐器的演奏。

1976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对在酒楼和夜总会的表演者抽人头税，这严重影响到酒楼表演者的生计。80年代卡拉OK开始盛行，伴奏乐队往往



年轻时的杨票敬以笛子独奏《鄱湖渔歌》至今成为绝响



郑思森从60年代起就从事酒楼华乐演奏
(图源：民艺音乐公司出品的唱片封面)

只剩一个人，只要弹奏键盘乐器就可以了，这些酒楼华乐演奏者的演奏生涯可说是走到了尽头。许多酒楼华乐演奏者只好改行。有许多人到学校教导华乐，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学校的华乐开始起飞，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也在时任总理吴作栋大力支持下改名为新加坡华乐团。

票敬曾一度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成为专业演奏家，但在2010年新加坡华乐团到英国伦敦表演以后，他就离开了。他说这一生最感欣慰的是见过许多著名的指挥，在他们的指挥下演奏音乐，享受音乐之美。这些年票敬就在学校教导华乐，他也参加一些地方戏曲乐队，演奏地方戏曲，例如韭菜芭的道教乐团。总之几十年来，他的演奏生涯从未中断过，如今已74岁，仍然活跃于华乐坛。

黄国财加入香妃楼乐队

另一位曾经于70-80年代初在酒楼演奏华乐的是黄国财。他于1947年在中国福建南安出

生，1956年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当时他10岁，以超龄生进入崇正学校念小学一年级。1963年小学毕业后进入中正中学。当时中正中学的民乐队相当强，每年都有演出。新加坡早年很多知名华乐工作者都出自这个乐队，比如林亚历、郑朝吉和林哲源等。但那时候国财并没有参加民乐队，而是参加了学校的科学组，不过他有跟一位姓俞的同学学习吹笛子。

1965年中正中学闹学潮，学生罢课，学校的演出因此被取消，民乐队也被解散。1968年民乐队重组，许多旧团员都离队了。国财当时已经升上高一，开始加入这个民乐队。1968-1969年，他被推选为民乐队队长，指挥是连江秋老师。

1970年，国财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由郑思森指挥的国家剧场华乐团，成为该团的笛子手，不过半年后就离开了乐团。当时黄裕厚也在香妃楼组织了一支小乐队，票敬推荐国财加入这个乐队。从1970年起，他就开始了酒楼华乐演奏的生涯，直到1983年。

香妃楼

聘請台灣秀唱
禮台雋唱
金自台雋唱
重來歌壇
長期駐唱

全能藝術歌后
閻荷婷



青春璞玉
閻莉婷



尚有皇馬紅星
秋璇·李美美
萬年紅華樂隊
伴奏

Emerald Room

新加坡東陵路拉維律十一號
(由Killiney Road入)
電話：三三二〇
二七四九五

香妃楼在《电视与广播》186期封底刊登的广告



为歌星梨川伴奏，左起为黄国财、黄裕厚



1971年，万年红乐队在电视上演奏《万年红》

在嘉兴从事乐器修理

1983年掌管嘉兴企业的杨秀伟，邀请国财进入公司，主要是从事各种乐器的维修。举凡各种乐器的瑕疵、损坏、断裂等问题，都必须想办法解决。古筝、胡琴、弹拨乐器、大提琴、倍大提琴、管乐器，特别是笙，需要调音、堵漏气、修整按音键才能出货。

秀伟特地给国财另辟了一个“修理”部门，专事“售后服务”。除了公司的货品，也接收各中小学校、乐团的乐器维修。这是没人做过的业务，国财可算是新加坡第一人，给嘉兴带来了许多生意。

在各种中西乐器维修中，最繁琐、麻烦的乐器要算是“笙”了。笙的种类繁多：传统的17、21簧，改良型加键36簧高音笙，有方斗、圆斗、有扩音筒及无扩音的；有苏州制的按钮式键盘扩音笙；有北京制的推拉杆式传统竹苗扩音笙；有24簧、32簧苏州制低音大抱笙等。

在国财所修理的乐器中，笙是他修得最多，

最有心得的乐器。他修过新加坡第一台低音大抱笙，较后许多中学乐队都相继采用此乐器。职业化的人民协会华乐团团员李粉德、余昌松、吴晓钟等的笙，都由他维修。他一生中修理过的乐器种类不计其数。他敬业乐业，与秀伟合作无间，直至退休为止。

访谈过以上几位曾经在酒楼演奏华乐的朋友，我又安排了另外一次聚会，这次增加了黄山、刘光焕、黄裕厚、杨秀伟等，大家在一起畅谈酒楼华乐。

刘光焕业余常做“替工”

刘光焕生于1949年，小学时在崇福学校念书，起初学习二胡及打击乐，二胡启蒙老师是爱同崇福校友会联合民乐队队长李才茂，后来又跟李才茂的弟弟李才祺继续学习。1962年小学毕业后转入中正中学，1965年念中四时加入中正民乐团。

刘光焕的“死党”蔡新林是非常优秀的二

胡、高胡手，当时他是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首席，指挥是林哲源。林哲源把当时华乐界的精英都纳入他指挥的乐队中。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和乐友们在同济医院前一摊咖啡摊喝茶谈天。据说这家咖啡摊的锡兰茶很特别，因为加了斑兰叶，味道特香浓。当时参与谈天的有林明钊、杨培贤、杨票敬、蔡新林、刘光焕等。刘光焕并没有参加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他只是跟着蔡新林。

后来蔡新林在酒楼演奏华乐，偶尔有时候因为跟女友拍拖，就找刘光焕做替工。另一位经常找刘光焕当替工的是拉二胡的黄裕厚。当时他们主要是在红星酒楼和会宾楼（Hotel Royal）演奏华乐。刘光焕做替工只是业余性质，因为他白天在九八行工作。

黄裕厚自学乐器演奏和歌唱

黄裕厚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麻坡（Muar），小学上麻坡中化一小，中学进入中化中学，念完高一就到新加坡，进入当时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西洋画。1964年，他毕业后在大新印刷公司当美术设计员，后又进入另一间著名的日本公司——凸版印刷公司当设计员，专门设计书本的封面。

裕厚在小学的时候就有上音乐课，因此爱上了音乐。中学时代的音乐课有很多著名的老师，比如来自新加坡的丁祝三、田鸣恩、陈毓申，还有来自香港的姚萍等。他学习了乐理和声乐，歌唱得不错，后来在酒楼演奏华乐时偶尔也唱歌，深获好评。小学时代他听到有人奏华乐，就自学了扬琴、二胡和笛子。中学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支小乐队，校庆的时候上台演出。在南洋美专念书时他也参与一些音乐活动，加入了当时人民行动党中央文化局民乐队。这个民乐队由时任文化部长李炯才和议员林源河倡导，指挥洪志云。

1966年，国家剧场属下华乐团成立，人民行动党中央文化局民乐队队员便成为第一批创团团员。洪志云和李煜传担任过短期指挥，后由郑思森接任。他把整个乐团搞得有声有色，录制了多张唱片。两年后郑思森离开了，李雪岭接任，黄裕厚也跟着离开，和友人创立了一支乐队，叫做“万年红”，成员大多数是国家剧场华乐团成员，包括金延之、周亚发、杨票敬、陈增荣、

李辉成、黄清良、李汉成等，专门在电视台为歌星伴奏或在一些歌乐节目中演奏。当年电视台主要的负责人有冯仲汉、萧之沧、林兴导等文化人。

裕厚后来也参加了新加坡电影戏剧研究社，社里常有话剧团的演出，他就带领乐队为电台、电视剧广播剧录背景音乐，也为一些歌星伴奏。万年红乐队经常出现在电视台的节目中。

后来华士满（Wisma）酒楼需要一支乐队，裕厚就把万年红的班底搬到华士满。当时参与的团员还有黄国财、杨敦波等人。约两年后，他又带着这批人进入香妃楼表演。在这些表演中，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梨川。本地歌星梨川最早是在海燕歌剧院演唱，后来跟着裕厚到香妃楼演唱，因日久生情而成婚。当时在香妃楼演唱的还有罗琼芳、方云、刘金莲，香港的林美仪和台湾的姚玮等。

结语

当时新加坡的酒楼华乐，其实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即酒楼华乐文化。该文化始于本地懂得欣赏华乐的酒楼餐馆业主，以及外来的音乐家如郑思森和吴大江等。酒楼华乐文化养活了一批本地的华乐工作者，开启了华乐职业化的先河，使这些当年被视为“不务正业”，甚至“有辱华乐”的音乐工作者得以延续他们的兴趣，即成就了自己，也养活了家人。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到酒楼餐厅吃饭的寻常百姓有机会接触华乐，无形中把华乐推广到了民间及草根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华乐的生存空间。酒楼华乐文化在华乐的发展史上，可说是功不可没。

如今的酒楼餐馆已经少有用现场乐队为食客助兴了，多用的是U盘音乐或卡拉OK。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如今的华乐，无论在任何音乐领域，如地方戏曲、西洋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甚至爵士乐和新世纪音乐方面，华乐皆可胜任。这与当年酒楼华乐文化的形成不无关系。酒楼华乐文化大大开拓了人们对传统华乐的视野，亦发掘出华乐多元化发展的可塑性。

题图说明：

茶叙留影（左起：林明钊、郭永秀、杨票敬、刘光焕）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潮起扬帆展雄心 踏浪远航启新篇

写在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
创建二十五周年之际



文·罗福腾 李伟雄
图·新加坡社科大学

1999年1月，新加坡社科大学迎来了首批中文系兼读课程学生，自此，中文系在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舞台上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时光荏苒，转眼间已是25载。2024年8月，我们迎来了首届全日制中文系课程的38位年轻学子，这不仅是中国文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新一代学子的到来，为中文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培养本地华文人才的信念和坚守弘扬华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在这些年轻面孔中，我们看到

了未来中文教育的希望，也感受到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责任。

值此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成立25周年之际，回顾往昔，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节点，更是对所有致力于华文教育的前辈和同仁们的致敬。正是他们的坚持与奉献，让中文系在岁月的流转中屹立不倒，薪火相传。今天的中文系在探索与创新中不断前行，力争为新加坡华文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首中文系25年峥嵘岁月，展望未来。我们





SUSS中文系早期招生宣传册及与北师大合作时期编写的学习指南

将秉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文教育的热忱，排除万难，开拓深耕，坚定向前，为新加坡培养更多“精华人才”。让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燧火不息为华教

1993年，设立中文学位课程的构想初现。彼时，新加坡经济蓬勃发展，新中建交不久，国人对华文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1993年8月30日，教育部人员开始与新加坡管理学院（SIM）商讨开办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的可能性，该院的运营总裁游保生教授带领团队，进行了多次分析和测算，发现该项目需每年至少招收108名学生才能达到财务平衡。市场反应的不确定性使得该计划一度搁置。

同年6月，教育部向SIM提出与中国高校合作，以此降低成本，推动中文学位设立设想。同时，教育部调研发现，彼时全国4012名华文教师中，约71.3%未持有大学文凭，华文教育水平亟需提升。对中文以及中文教育的热爱，成为推动新加坡成人中文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虽如燧火，却长明不灭。

1995年，三方会议在教育部政务部长简丽中博士主持下召开了。教育部、新加坡管理学院（SIM）、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共同探讨中文学位的实施细节。历经五年的磋商与探索，1998年3月，开放大学（SIM-OU）确认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举办汉语言文学学位课程。同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将完成该学位的教师纳入学位薪金系列，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了确保学位的教学质量，开放大学专门聘任杨松年教授担任学术顾问，为课程大纲、教学运行、考核评鉴等做学术把关人。经过几番波折与各方努力，汉语言文学学位项目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迎来了首批学生。

搏击千里青云路

1999年1月，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项目正式招生，首届超过180人入学。中文学位项目的设立不仅顺应了新加坡与中国往来日益密切的趋势，也满足了本地教师提升学历的需求。然而，中文系在创建之初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新加坡本地高等中文教育师资严重不足。为填补这一空缺，国大中文系的教授们积极参与，热情支援教学工作。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与南京大



学的专家学者也定期飞赴新加坡，开展集中授课，确保学生能够接受系统、优质的教育。这种海内外的协同合作，不仅为中文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促进了本地中文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学士学位的顺利运作，开放大学陆续推出中国语言文学文凭、中英翻译文凭等一系列课程，满足不同群体的进修需求。

在历经五届学士学位毕业生之后，开放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于2005年顺势推出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课程，接着又与南京大学合作推出博士学位。中文系的发展自此进入全面稳步发展的阶段，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本地中小学华文教师，以及大量具备汉语言文学素养的专业人才，为国家、社会和华社输送了大批华文专才，创造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本地华社对中文教育项目的支持也不遗余力。2003年起，本地养正基金无条件提供中文毕业生奖项资助，南洋孔教会自2015年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的学习成就。2023年，本地商人沈怀祖先生捐资40万元，设立“沈氏中文基金”，并获得政府配套拨款，形成100万元的永续中文教育基金。2024年，沈先生为支持全日制中文系学生，再次慷慨捐资40万元，加上政府配套拨款，使沈氏中文基金总额增至200万元。同年，中文系获得新加坡龙溪会馆的捐资，设立了“龙溪会馆中文永续基金”，每年提供两份中文奖学金。此外，本地慈善家黄马家兰居士也慷慨捐赠，为全日制中文系学生每年提供五份奖学金。这些社会力量的支持，不仅增添了中文系学生的信心，也推动了中文系的发展，成为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后盾。



中文系学生何佳怡（左边身着红色旗袍者）
代表新加坡参加2024年新马青年交流计划

鲲鹏展翅九万里

2022年，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迎来了具有中国大陆、台湾与新加坡多元文化学术背景的李伟雄博士担任主任，打开了中文系的视野，增添了活力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李博士上任后，秉持着丰富的跨文化教育经验，对课程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提出以“新加坡视角”与“南洋视角”并重的理念，将本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融入课程体系，使中文系的课程内容不再局限于中国视角，增添了浓厚的南洋文化气息，更加符合新加坡特色。这种调整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本土文化认同感，也使课程内容更贴近新加坡社会发展的需求，赢得了本地学生及华社的广泛认可。为更精准地体现出新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本土特色，学科名称从原“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正式更名为“中文学士学位”。

2023年8月，中文系宣布开办全日制中文学士学位课程，成为新加坡第三所提供全日制中文



全日制中文课程暨沈氏中文基金启动发布会 (左五为基金捐款人沈怀祖先生)

课程的院校，此举在本地华社引发了热烈反响。长期以来只有国大与南大两所顶尖大学设有全日制中文系，致使许多有志于中文教育的学子被拒之门外。如今，新加坡社科大学推出的全日制中文课程，为这些年轻学子提供了继续深造的优质选择，使他们在本地也能追求中文高等教育的梦想。同时，这一新课程的设立也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积蓄能量，培养出更多精通华文和中华文化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华文教育人才的迫切需求。

此外，中文系自创立以来一直以部分时间制（成人教育）为主。全日制中文课程的推出让我们能聚焦于兼顾成人学员与全日制学生的双轨制发展模式，不仅为那些志在中文领域深耕的年轻学子提供了新的成长平台，也继续为在职成人学员提供进修机会。在新加坡，终身学习已成为个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重要基石。中文系始终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在职人士提供灵活且多样化的学习途径，让他们在工作与学习之间实现有效平衡。通过设置针对不同职业背景的课程模块和实践导向的学习内容，中文系支持学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推动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一飞跃性的改变，标志着中文教育在新加坡社会日益重要的地位，更彰显了新加坡社科大学服务社会、推动华文教育普及的使命担当。

双轨制模式下，中文系不但能提供扎实的语

言文学训练，还将兼顾学生的多元需求，为本地华文教育以及华文相关领域培养具备专业素养与跨文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这样的发展蓝图，不仅让本地社会对中文教育的前景更加期待，也满足了新加坡不断增长的华文教育需求。通过双轨制培养体系的多元化设计，社科大学中文系正朝着全面深化中文教育的方向迈进，为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事业开辟了新天地。

御风而行向未来

“鲲鹏展翅九万里，长空无崖任搏击。”中文系的发展，不仅是新加坡社科大学自身成长的缩影，更是本地华文教育与文化事业蓬勃兴旺的写照。回望中文系的创建、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本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学界的学术推动、社会各界的资源倾注，以及每一位教学、管理、行政工作者的默默耕耘。正是这些点滴努力，共同编织出中文系25年来的辉煌篇章。未来，中文系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成为本地中文教育的核心高地，培养更多具备全球视野和本土情怀的华文人才，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注入更深厚的华文根基。

随着社会对中文需求的日益增长，中文系也将致力于不断创新，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教育环境。面向未来，我们不仅会在课程内容上更加贴

近南洋地区的文化实际，还将鼓励学子跨文化、跨学科地拓宽知识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需求。未来的课程体系将涵盖更多元的文化内容，强调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建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助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从容地传播华族文化。同时，我们将不断强化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知名学府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国际交流机会，使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依然能够坚定自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

未来，我们也期望在更多本地企业和机构的支持下，推出华文教育相关的奖学金、科研资助项目，为那些志在学术研究或教育推广的学生提供无后顾之忧的成长平台。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人的激励，也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汇集，让中文教育的火炬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手中薪火相传，长燃不息。中文系愿景的实现，必将为新加坡的文化多样性增添光彩，让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茁壮成长，成为新加坡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只要有学子求知若渴，中文系便会为他们提供知识的沃土；只要有华文教育的热忱，华族文化的传承便会生生不息。中文系不仅要承载起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更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美好的未来书写更多精彩篇章。

附录：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大事记

时间线	事件/事项
1999年1月	第一届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开班，由北京师范大学授予学位。2008年招收最后一届学生。
2003年7月	开设以下大专文凭、单项证书课程，由开放大学颁发文凭： 中国语言文学大专文凭 中英翻译大专文凭 中文与商业大专文凭
2005年1月	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班开班，由北京师范大学颁发学位。2014年结束招生。
2009年1月	推出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新课程大纲，首次由新跃大学颁发学位。
2010年1月	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班开班，由南京大学颁发学位。2014年结束招生。
2010年7月	与隶属南洋理工大学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联合开办“华文教育学士学位”，由新跃大学颁发学位。2014年招收最后一届学生。
2017年1月	新跃大学成为新加坡第六所公立自主大学，更名为新跃社科大学。
2023年8月	推出改革后的中文学士学位，并于2024年1月学期招收第一届兼读课程学生。
2024年1月	新跃社科大学更名为新加坡社科大学。
2024年8月	第一届全日制中文荣誉学士学位课程新生入学。

(作者罗福腾为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雄为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主任)



新加坡社科大学与推广华语学习委员会联办2024年新加坡大专华文阅读节 (左六为活动主宾蔡瑞隆政务次长)



檳城新江邱氏与星洲邱菽园



文图·陈煜

在 檳城，邱是华族五大姓（邱、谢、杨、林、陈）之一。龙山堂邱公司（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是特殊的血缘机构，只接纳源自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三都新坡保新社的同宗。他们得益于特定的世系传承与共同的乡土信仰，通过集资置业生息，在檳城建设庙宇宗祠、兴建店屋排屋、开辟家塚，为宗人提供福利保障，维持与原乡的联系。新江邱氏在檳城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经由贸易扩展至南洋各地，在星洲亦有不少声名显赫的族人。本文通过梳理新江邱氏在檳城的宗族机构，龙山堂邱公司作为血缘地缘自治团体所担负的职责，以及星洲邱菽园作为宗族名仕的跨境影响力，展示华人南来马来亚以血缘构筑的社会网络。

檳城新江邱氏宗族

檳城龙山堂邱公司于2001年保护性修复后，组织出版相关的华英双语书刊，包括题为《认识与欣赏龙山堂邱公司》的导览手册，以及题为《檳城

龙山堂邱公司：历史与建筑》的专书。在已故建筑修复专家陈耀威的主持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新江邱氏的源流及其在檳城的传承，对于龙山堂建筑亦做出较为详尽的介绍。在这些研究出版的基础上，龙山堂邱公司在龙山堂底层设立邱氏文物馆，以多媒体的方式教育后裔，向访客宣传宗族文化。

虽然难以考证新江邱氏南来的确切时间，同治丁卯年（1867）诒谷堂版的《新江邱曾氏族谱》显示，早在1527年，邱世派（八世）前往汶莱卒于当地。在檳城，邱模量可能是最早的族人之一，推测其抵达时间在1775年左右。1786年檳城开埠后，吸引更多新江邱氏前往，并将原乡信仰带到居留地，以姓氏守护神“大使爷”加强族人间的联系。

为了延续海外宗族祭祀传承，102位族人于1835年联合成立宗亲会“诒谷堂”，筹集528元的建宗祠基金。经过多年运筹帷幄，在强有力的族亲领导下，于1850年以“邱家大使爷”的名义，购置面积高达9万7035方尺的英商产业，即现



檳城文山堂邱公司主体建筑



邱氏敦文堂的社团标志



龙山堂邱公司位于大统巷的排屋产业



檳城新江邱氏家



龙山堂拜亭内的八字型楼梯

在龙山堂所在地。次年将界内旧建筑翻修改造为宗祠，按照原乡信仰习俗供奉祖先牌位与大使爷。

在檳城的新江邱氏宗亲机构，沿袭原乡的宗族关系而发展。在新江社的邱氏按照祖源分为四大柱（又称：四大角，即第五至八世基祖的后代），计有13房派，分布在村内13个角落（即片区），各房均自建祠堂，因人丁与财力的不同，规模各不相同。各房奉祀共同的姓氏守护神与地方神灵，合力兴建的宗教建筑，包括正顺宫（主祀姓氏守护神王孙爷和大使爷）与福灵宫（主祀漳州地方神保生大帝）。

作为族人自发组织的团体，在檳城的新江邱氏复制原乡经验，加以在地化与制度化。早期诒谷堂以“邱家大使爷”的名义进行置产投资，由各房推选的代表组成家长和董事会。1906年龙山堂重建落成后，以“龙山堂邱公司”为大祖代表集体利益，管理逐渐制度化。1919年由四大柱各委派七位代表，组成28人的信理会共同管理，信理员为终身制。1955年龙山堂邱公司注册为社团，1976年改为注册信托团体，至今仍是由四大柱组成的信理会共同管理。

如同在原乡一样，新江邱氏四大柱13房在檳城的发展亦不均衡，他们根据祖源成立分支组织，并

各自购置产业设立祠堂。例如，海墘角五房设立的“文山堂邱公司”，其祠堂坐落于海墘新路，落成于1878年，其建筑型制为龙山堂所效仿并扩展。

血缘地缘自治团体

在英国殖民时期，与众多华人宗乡机构一样，龙山堂邱公司是具有多元功能的自治团体。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血缘与地缘双重性质的机构，自创办之初便有着明确的置产意识，沿袭原乡设置“公田”的传统，集资购置房地产，通过收租经营，将收入用于兴建维护宗祠、举行祭祖典礼、为宗人提供教育福利等。其早期设有存款部，提供类似银行信托的服务，既为存款的族人提供利息，亦为需要融资的族人提供资金，这一宗族金融系统因1969年银行法的实施而终止。

龙山堂邱公司于1850年购置的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除了翻修改造宗祠，在场地一侧兴建洋式“宗议所”处理族务，另外两侧兴建排屋为宗人提供住宿，沿街兴建店屋用于经商出租，围绕宗祠形成聚族而居的单一姓氏聚落。另一重大投资是在1920年，时任22位信理员再度以“大使爷邱公司”的名义，以23万5000元向邱天德后裔购买379英亩的天德园，其中17英亩的山丘划定为“新



龙山堂二层步廊无与伦比的石雕



龙山堂邱公司建筑群的宗议所与戏台



龙山堂内供奉大伯公的福德祠



龙山堂邱公司建筑群的排屋产业



金碧辉煌的正顺宫内景



诒谷堂内的神龛与文魁牌匾
右上为邱炜萋(菽园)所立

江邱氏家家”。龙山堂邱公司在乔治市拥有200多间店屋，在槟城拥有大量园丘土地，经过近两百年的持续投资发展，成为“北马最富有的华人团体之一”。

龙山堂邱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得益于四大柱选拔的信理员，彼此之间协作制衡，逐步完善公司章程，将产业与福利管理制度化，以祠堂所象征的宗族权威处理内部事务。为了协调处理族人的白事与福利分配，于1884年设立“敦文堂邱公司”（The Parentage Society of Khoo Clan）以及“邱氏家族自治社”（Self Protecting Society of The Khoo Clan, Penang）。

龙山堂邱公司累积的雄厚财力体现于其富丽堂皇的龙山堂建筑群。1894年拆除旧祠以兴建新祠，遗憾的是，新祠落成不久后于1901年辛丑除夕夜遭遇大火，全部烧毁殆尽。1902年鸠工重建，于1906年落成。龙山堂在世纪之交的两次重建历时12年，相传每次耗资十余万元。宽敞的场地满铺条石，两层高的主体建筑为三开间，二层中间为正顺宫，主祀王孙爷与大使爷；左手边为福德祠，奉祀福德正神大伯公；右手边为诒谷堂，为新江邱氏大宗祠；与主体建筑对望的是戏台。这一建筑群在型制、石雕、木雕、剪粘、彩画、壁画等方

面，呈现当时闽南传统建筑的顶尖技艺，楼宇化的建筑与八字型大台阶有着土著民居的影响，铸铁栏杆的运用显示对于西洋建筑材料的喜好。龙山堂建筑群至今保留完好，是南洋罕见的华族建筑奇珍。

龙山堂与星洲名仕

龙山堂邱公司见证华族在槟城落地生根，沿袭原乡的宗族礼法制度。在华族“仕、农、工、商”的传统观念中，经商致富虽可以光宗耀祖，然而，学而优则仕是宗族昌明的精神动力。龙山堂建筑落成后，在诒谷堂与福德祠中分别悬挂了43幅与65幅的鎏金牌匾，这些是1894年至1983年新江邱氏的功名榜。诒谷堂神龛之上悬挂的两幅“文魁”牌匾。左手边的一幅是最早的，也是等级最高的，牌匾左侧题刻“太子太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部堂兼管福建巡抚谭为”，右侧题刻“光绪二十年甲午科福建乡试中式第五十九名举人邱炜萋立”。邱炜萋就是被誉为“南洋诗圣”的邱菽园（名：德馨，1874-1941）。

邱菽园出生于新江，卒于星洲。其父正中（名：笃信，号：勤值，1820-1896）是南来第一代。相传于1840年20岁时南来星洲，白手起家，主要经营西贡大米生意，亦多方面投资而成为巨富。



邱炜菱（菽园）撰写的“重修龙山堂碑记”

根据宋旺相的记述，邱正中遗产高达上百万元，菽园与弟弟各继承70万元。邱正中是乐善好施的福建社群领袖，1888年告老还乡，1895年回到星洲，次年以76岁高龄逝世，遗骨由菽园带回原乡安葬。

邱菽园是正中54岁得来的老来子，6岁时南来星洲，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回乡继续深造。1894年20岁时参加福建省级乡试考获举人，次年赴京会试未能获得功名，次年因父亲在星洲去世，遂返回继承家业，成为南洋罕见的考取功名的人物。槟城诒谷堂内的“文魁”牌匾是时任闽浙总督谭钟麟为他而立，谭于1895年调任两广总督，有理由相信此匾是立于1894年。龙山堂第一次重建始于1894年，推测当时新江邱氏以菽园的成就而求获此匾。这幅牌匾究竟是1894年的原件，还是1901年大火后复刻的，目前尚不得而知。

邱菽园的才情为南洋华人所景仰，在继承父亲巨额财富后，他由反清转变为拥帝，慷慨捐输而获加官进爵，成为海外新江邱氏官阶最高的人。1906年龙山堂第二次重建落成时，槟城新江邱氏族长请其撰写“重修龙山堂碑记”，他以“花翎二品顶戴派克京师正阳门工程监理官广东试用道乡进士炜菱”为名撰写长文，记录龙山堂两次重修

的经历，留下珍贵的文献记录。

邱菽园与弟弟继承巨额遗产。遗憾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两兄弟都未能继承父亲的经商才干，双双投资失败，于1907年宣告破产。本地文史学者多以为邱菽园晚年破产，穷困潦倒以卖文为生。事实上，邱菽园继承遗产时年仅21岁，破产时亦刚过而立之年。1937年他在武吉布朗坟场为自己设计兴建生圻，以“处士”自居，豁达地与女儿女婿在墓前合影，其坟茔规格亦非贫穷之态。

结语

福建新江邱氏南来，在槟城建立起庞大的宗族，通过祭祀共祖与地方神灵，建立完善族规约定，通过集资置产兴业，以举族之力兴建的龙山堂建筑群，成为南洋最为绚丽的华族建筑古迹之一。落地生根后的槟城新江邱氏逐渐接受英文教育，出现“峇峇化”的特征。然而，制度化的管理使得宗族文化得以传承，通过提供教育与福利以培养人才团结族人。

龙山堂邱公司代表槟城新江邱氏的集体利益，不仅维护在地宗亲的利益，亦维持与原乡的联络，特别是宗祠庙宇的建设与地方治安的维持。早在1816年，槟城新江邱氏以“大使爷榔榔屿公银”为名，为原乡正顺宫的重修捐款120元；1863年至1867年间，又以诒谷堂的名义资助修订出版《新江邱曾氏族谱》，占总费用的四分之一强。原乡的正顺宫在文革期间被毁，1995年至1997年重建时，龙山堂邱公司贡献高达250万令吉。

新江邱氏在星洲的宗族势力虽不如在槟城的强大，亦有着相当的影响力。邱正生前享有崇高威望，菽园亦以文章学问而闻名，他在为族亲扬阵（1857-1943）题写的墓志铭中，提及本地族人对初来乍到的族亲颇为赏识，助其经商。邱扬阵以经营大米生意而发家，后来大举投资金融业而成巨富，身后葬于武吉布朗坟场，其子德拔（1917-2004）曾是新加坡首富，2002年为龙山堂邱氏文物馆捐款。

题图说明：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主体建筑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百年长堤的 昨日今生



文图·李叶明

新加坡与柔佛州之间，隔着一条狭长的柔佛海峡。100年前，一道连接海峡两岸的长堤落成。如今，这道长堤可说是全球最繁忙的跨境通道，每天有25至40万人跨堤到对岸工作、学习、购物，或是探亲访友、度假休闲。在周末或节假日，跨越长堤的人数更多达50万。这道长堤将柔佛海峡两岸紧紧相连，见证了两岸的繁荣与发展，也让两地民众的情谊得以绵密共生、难分难舍。

两岸同庆百年史

新柔长堤是在100年前（1924年6月28日），由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劳伦斯·基里玛（Laurence Guillemard）主持落成的。当年的这项大工程，与马来亚铁道在1909年通车有关。铁路修到新山后，从新山到新加坡仍需依赖渡轮运输。可是两岸间的货运量在短短五年内，就猛增了五倍之多，渡轮服务明显难以负荷。于是，在海峡上建一座大桥，就成了呼之欲出的解决方案。

可是在请来工程专家后，发现柔佛海峡涨潮和落潮时，海平面落差介于14米至21米。要在如此忽高忽低的海面上建桥，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殖民地政府选择了一个

最传统的方案，宣布将建一道由花岗石堆砌成的长堤，堤面宽18.3米，长约一公里，以联通海峡两岸。

这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宏大的跨海工程，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殖民地当局预计耗资100万英镑，用5年时间建成。1920年4月24日，海峡殖民地总督基里玛爵士从新加坡乘渡轮北上柔佛海峡，登上停泊在海峡中央的海洋美人（Sea Belle）号，与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会合。在这艘游艇两旁，是两艘载着500公吨花岗岩的平底船。在总督拉下丝带后，平底船上的花岗岩被推下船，沉入海床。海面上的船舶一起鸣笛，最后还放了五响礼炮，宣告新柔长堤在这一天奠基。

当时筑堤用的花岗岩来自武吉知马山和乌敏岛的采石场。石块大小不一，最大的可重达五顿。填海所需的石块总量，足以填满460个标准奥林匹克游泳池。当局动用了超过2300名劳工，他们以简陋的运输工具，将一批一批石块运至柔佛海峡中的施工现场，日复一日地不间断填海，最终筑起了长堤。今天，当你在武吉知马山和乌敏岛上欣赏那美丽的矿湖时，你可知道这里的石头去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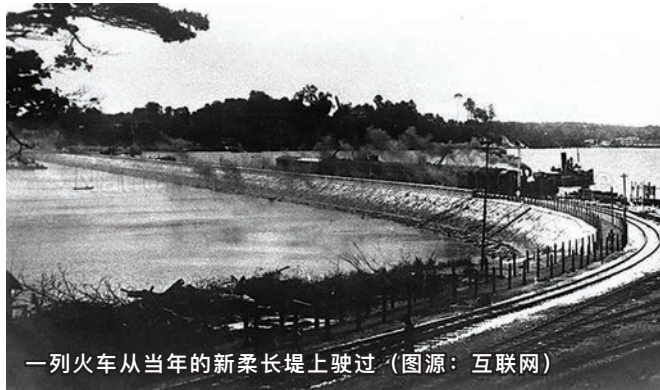
新柔长堤在1924年6月11日竣工。工程最终耗资1700万海峡元（当时海峡殖民地发行的



建长堤的海峡殖民地
总督基里玛爵士
(图源: 互联网)



当年在新柔长堤上行驶的汽车 (图源: 互联网)



一列火车从当年的新柔长堤上驶过 (图源: 互联网)

Straits Dollar), 大致相当于现在8亿7443万新币。这笔经费由马来联邦、柔佛州和海峡殖民地政府共同分担。

100年后, 为庆祝这第一条连接新柔两岸的陆路正式启用, 两地政府领导人在今年6月28日, 共同到长堤上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新加坡外长维文医生和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 率领双方代表团在柔佛摄政王东姑依斯迈的见证下, 在新柔长堤零公里处、新加坡往新山方向的车道上, 共同放飞了100只和平鸽, 同时也在庆祝长堤100周年的纪念牌上签字并互换纪念品。为避免影响长堤上的车辆通行, 仪式在10分钟之内完成。

过后, 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率团跨过长堤, 到位于兀兰地铁站旁的兀兰民事中心, 与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一起为“新柔长堤 百年之情”特展主持开幕仪式。

唐振辉部长在致辞时说: 新柔长堤不仅是一条繁忙的陆路通道, 也是新马建筑史上重要的一页, 更象征着新马两国人民的亲情和友谊。不论是每天越堤工作或上学, 或是在佳节期间越堤与亲友团聚, 多年来, 长堤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互动往来。他还分享说, 他的母亲出生在霹靂州, 他小时候总是期待着过长堤, 因为这意味着假期的到来。他表示, 长堤也见证了两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商贸通道, 为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未来合作, 奠定了稳固基础。

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致辞时也强调, 新柔长堤促进了两岸联系, 成了人们往来学习、就业和探寻新机会的要道。但这份特殊的关系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需要双方持续努力, 还得感谢上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基础。他也感谢两国领导人的支持, 改进柔佛与新加坡的连通性, 以及共同发展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等。

百年长堤两岸情

当局表示, “新柔长堤 百年之情”特展在兀兰民事中心展出一个月后, 会陆续走进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和城市广场。当局也计划把展览带到公共图书馆和本地学府。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也设立了网站 (<https://go.gov.sg/causewaycentenary>), 让公众浏览与长堤相关的档案记录、照片和口述历史等。

在特展的展出内容中, 除了历史图片和相关资料, 也有民众分享他们对长堤的回忆。例如其

中一位20岁的大学生曾苡萱，她从7岁起就每天越堤到新加坡读书，直到读完中学。当时她每天凌晨4点就得起身，准备搭校车。学校有课外活动时，她到家时往往是晚上8点了。“虽然来回两地上学会觉得比较累，但我自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我就尽量利用时间复习，在巴士上休息。”

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新柔长堤并不算长，只有1056米。可是要跨过它却相当耗时。因为先需要办出境手续，很快还要再办一次入境手续，这就要排两次队，行李和车辆还要过安检。2008年，策划恐怖袭击的回祈团新加坡分支的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从拘留所潜逃，跑到马国藏匿一年多。在那段时间，新柔长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每天越堤的民众就只好承受更长的排队等候时间。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为控制疫情，新马两国都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进出境检疫和隔离措施等。这导致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无法像往常一样，每天利用长堤在两地间通勤。两国政府还一度决定，关闭长堤。原本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长堤，一夜之间变得空无一人。这是在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柔长堤最冷清的一段时期。

直到2022年4月1日，新加坡解封，长堤也得以重新开放。当局让已接种过疫苗的民众可以像以往那样随时跨过长堤。很多在本地工作、思乡已久的马国民众，迫不及待在当晚午夜12点长堤重开之际，步行沿长堤进入马来西亚。一时间欢呼声四起，久别重逢的家人们在长堤那一头相拥而泣，团聚的感人场面被无数镜头纪录下来，成为百年长堤上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百年长堤生死劫

新柔长堤在这一百年来还曾两次面对“生死”。先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1941年12月8日在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和泰南北大年等地登陆，一路攻势迅猛；英军则望风南逃，在1942年1月放弃马来半岛，并在1月31日弃守新山，全部撤回到新加坡，准备固守这个被他们称为“远东直布罗陀”的孤岛要塞。

为了保卫新加坡，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英军派工兵安放大量炸药，先后实施两次爆破，最终将长堤炸出了一个大豁口，彻底切断了这条

陆路通道。英军炸堤时，导致长堤上的输水管也断裂。可当时谁还管得了这么多。挡住日军的进攻，才是命运攸关的当务之急。

日军在占领新山后，很快架起重炮对新加坡猛轰。2月8日，日军发起登陆战，仅用7天就打败英军。白思华中将代表十余万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向山下奉文投降。之后日军迅速修复长堤。因为整个英属马来亚都已落入他们手中。两岸人民也一起经历了长达三年八个月黑暗的日本占领时期。大批民众死在日军屠刀下，也有不少新加坡人在日军的驱赶下跨过长堤，到马来半岛去垦殖。

好在新柔长堤总算是在战火中幸免于难。可没想到在战后，长堤再一次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1996年，时任马国首相马哈迪认为，长堤阻断柔佛海峡的水流，造成淤塞和污染，同时也阻断海峡中的航道。他提议拆除长堤，取而代之建一座大桥，他要把柔佛海峡发展成一条繁忙的航道。

由于新加坡不同意拆长堤，马哈迪于是提出“弯桥计划”，就是只拆除马来西亚境内的部分长堤，建一座仅属于马国，可在桥下通航大型货轮的弯桥。这就要求桥面在短短数百米内须爬升到一定高度，随即往下与新加坡部分的长堤相连。因此这座桥只能建成弯桥，以增加爬坡的距离。可是在开工多年后，这座弯桥始终没能建成，“弯桥计划”依然搁置。新柔长堤也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百年长堤任我行

由于今年是新柔长堤百年纪念，多个团体都举办相关活动，包括徒步跨越长堤的百年文史之旅。随笔南洋网在8月3日也配合其首场国庆周末系列游活动，带领50多位网友沿着柔佛海峡南岸，由远及近细看新柔长堤，详谈百年故事。随后大家一起过关，步行跨越长堤，到对岸的新山市中心游览，包括陈旭年文化街、柔佛古庙等。

其实新加坡人对跨越长堤早就习以为常，只是很少人会用徒步方式。除了自己驾车或搭朋友的私家车，有人也会选择搭德士。另外，长堤上也通行火车和公共巴士，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在1971年就开通的170号巴士。这是两国间第一条川行于长堤的公共巴士路线。后来往返新柔两地的巴士路线越开越多，如950号、160号等。马

国方面也开通了Causeway Link等多条跨境巴士服务。

在长堤百年之际，用自己的双脚亲自到长堤上走一走，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纪念方式吧。所以活动消息一发出，报名非常踊跃。8月3日，我们一行50多人在兀兰地铁站集合，途径共和理工学院、海军部公园，走到兀兰海滨公园（Woodlands Waterfront Park）。这里就是柔佛海峡岸边。

公园里有一座400米长的L型码头，长长地伸向海面。这是本地最长的码头，也被认为是新加坡与新山最近的距离。在疫情阻隔期间，这里一度成为两岸亲友间“隔海相见”的热门地点。大家联上手机“面对面”交谈，隔着海峡挥挥手，也能挥去不少思念的愁苦。

这座历史悠久的码头，曾隶属于马来亚皇家海军。在码头的左侧就是新柔长堤，白色的大水管非常醒目，甚至连水面上的倒影都清晰可见。这条建成于1926年的水管，每天从柔佛蒲莱山（Gunung Pulai）集水区向新加坡市区珍珠山蓄水池输送3800万公升水，以解决当时水源不

足的问题。在码头上稍微驻足，还能看到火车在长堤上驶过。

在码头右侧（东侧）是正在兴建中的新柔地铁跨海高架轨道桥。桥墩早已全部落成，桥面也快完成衔接了。两国政府曾发联合文告，新柔地铁将在2026年12月通车。届时民众可从兀兰北站搭新柔地铁到柔佛新山的武吉查卡站。新柔地铁采用“一地两检”，预计每小时最高载运一万人次，确保更快通关。

从滨海公园到长堤，有一条1.5公里的滨海步道。走到兀兰关卡过关后，第一次走在长堤上特别保留的人行通道，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身旁各色车辆穿梭往来，我们却能走走停停，随意拍照打卡，欣赏两岸的城市风景线和柔佛海峡的海岸线，还能遥看正在建设中的跨海轨道桥。那里正在开启两岸间下一个百年的发展序幕，而我们也似乎正走过百年沧桑，迈向一个新世纪。

题图说明：在兀兰海滨公园码头眺望长堤

（作者为随笔南洋创办人、专栏作家）



二战期间被英军炸断的长堤（图源：互联网）



从柔佛州一侧看被英军炸断的长堤（图源：互联网）



长堤旁建设中的地铁跨海轨道桥



徒步走长堤活动参与者与长堤合影

重构中的哲理

读黄明恭医生《切片报告》



文图·王建刚

我认识黄明恭医生是从他主编《新华作家说红楼》一书开始的。我以前和十渡先生分享过自己写的一篇红学研究文章，十渡先生是个热心人，他把我这篇文章推荐给正在征稿的黄医生。很幸运，我的这篇稿通过评审，被接受发表，也算给拙作找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而且从这以后，我也结识了黄医生。

后来，我陆续收到黄医生寄来他的著作，包括《切片报告》和《光海迷航》等。其中《切片报告》是一本散文集，文笔简洁明快，凝结作者的哲思和智慧。因为自己有过博士学习和训练的经历，我很喜欢哲理性文章，一口气读完了《切片报告》。在国外出差期间，我又细读了其中的一些散文。我还把这本书推荐分享给朋友，反映很好。

切片报告，是医学用语。顾名思义，就是医生根据拍照获取的人体横向切面图像写下诊断报告。从专业角度理解切片，我首先想到重构：从一序列二维切片图像恢复出完整的三维器官，从平面重构立体。黄医生为他的这本书写的自序是一首诗歌，诗歌最后两句：“但愿一个个小小的横切面/也是一个纵向的过程。”在重构这一点上，我和黄医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禁暗暗高兴。

黄医生作为一名资深精神科医生，深谙人的心理活动在支配一个人的行为所起的作用。在这本书中，他从自己和周边的人，包括他见过的病人、家属、同事、学生、朋友和家人等，所呈现的日常行为及一些典型片段，找出当事人可能的丰富的心理活动，记载自己的感悟，深刻，不乏亮点。

全书分五辑，分别是：《心情切片》《医疗切片》《亲情切片》《科技切片》《书写切片》。基本涵盖一个爱好文学写作的医生日常生活。作者文学造诣深，一篇散文，从开始落笔，到收尾，一气呵成，往往给人一种点到为止的感觉。如果把每一篇散文看成一个切片的话，作者的感悟既是报告，更是一种启示。黄医生把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很多时候给读者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读者掩卷思考，联想到更多问题。

“膀胱里的尿，积累久了，就渐渐失去表达的渴望。”（见《尿意》一篇），深刻，而又易懂。“人的关节，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就会造成不能伸缩的结果。”（见《从麻痹到麻木》），读到这里，我想起发生在身边的一个故事，恰好有同感。故事中的老人在几个儿女的家里轮换居住。在儿子家里的时候，老人每天为自己准备饭菜，亲自下厨房。等到了女儿家，女儿一看老人要动手，就抢着做，结果，老人从此不再亲自动手，活动明显少了。渐渐地，老人体能转弱，到去世时，肢体都有些佝偻，肌肉萎缩了。

“读呀读地便觉得昏昏欲睡，原来读诗真的不需要全看懂。”（见《认床》），读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诗“一生只读一页书”。诗歌确实不需全部读懂，有一句打动你，足矣，这也是我当诗歌刊物编辑时给自己定下的收稿准则。“作品一旦发表了，作者便无法控制作品的解读。”（见《不懂解读》），笔者曾经听有个朋友说，这叫“作者已死。”这种认识其实对于作者很重要，写

作发自内心，而非迎合。“一个过分忙碌的人，会逐渐失去爱人的能力。”（见《不只是游戏》），与其说是感悟，不如说是一种忠告。“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真理。”（见《将苦难合理化》），这让我想起离散数学中关于关系的定义，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

在《医疗切片》这一辑里，主要写作者在行医过程中，和同事或病人及其家属的互动。

美国医生爱德华讲过一句经典来解释医学的作用：“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黄医生在书里描述的治病过程，就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一个同性恋者为母亲的行为来征求医生的意见，儿子认为母亲抑郁；而母亲认为儿子性取向不正常，儿子才是真正的病人。结果，母子彼此心结越结越紧。黄医生留给读者的问题就是，他们母子俩到底谁是病人？还是都不是病人？书里告诫读者，医生能做的就是告诉对方每个人对性取向有信奉和选择的自由，要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

“原来她签名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患者的好，是想借刀杀人，希望手术刀夺去患者的性命。”

（见《同意书》），医院通过手术救活一个病人，居然收到家属投诉。读了这篇，相信读者都会受到一种震撼教育。笔者的女儿是一名本地医生，我也听她说起碰到过类似的经历，也一样受到震撼教育。

学会倾听和提醒，是作者对年轻医生的告诫。书里，一个壮志未酬的游泳老将，通过和医生沟通，成功走出阴影。如何看待婚姻、隐私、性格和失智症等，本书中都有提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问失智症病人的问题，居然是哲学终极问题，这是一种巧合吗？作者和晚年母亲的交往在“亲情切片”一辑占用了很大篇幅。面对年迈生病的母亲，无助感让医生作者联想到宿命。“来生我要做个单细胞。”（见《多重关系》），生命的纠缠，理不清，让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科技切片》和《书写切片》，读来画面感很强。《出版是为了告别》，确实，文字的力量是无穷的，告别之外，写作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合上这本书，回想书中的各种切片，很自然，有些切片会比其他切片印象更深刻一些。但奇妙的是，不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几篇，由这些切片重



构还原出的立体形象没有变化。一个鲜明的医生形象立在面前，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很鲜明，很清晰。

医生和患者其实是不对等的，和医生比起来，患者不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身体，往往都处在弱势。像小学生一样，医生问什么，病人回答什么，有时还担心自己什么忘了说。网络时代，病人从网上很容易获取有关各种疾病的介绍和治疗手段。甚至有人担心医生会被人工智能机器取代。但是，这些信息当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最重要的一点，它们多数是很表面的内容，而且不能像医生一样综合看待问题。因为信息爆炸和理解差异，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有时有冲突，甚至医闹。有关这方面，书中没有太多着墨，或许以后再版补充。

对普通人来说，医生的工作还是有一种神秘感。写作，或许为揭开神秘感提供了一个渠道。医学和文学握手，黄医生工作在医学一线，又有文学修养，两者落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值得读者庆幸的事情。

（作者为哲学博士、新加坡资讯通信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来自15所学校的大约25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译彩纷呈”翻译营

译彩纷呈 情牵岛国

文·薛兰芳 图·南洋女子中学校

今年，由南洋女子中学校主办，海星中学协办的第四届“译彩纷呈”翻译营，于8月22日与8月23日成功举行。这次的翻译营共吸引了辅华中学、耘青中学、华侨中学、圣公会中学等15所学校的大约250名学生及老师参与，参与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创下历来新高。今年的主题是“文化翻译之情牵岛国（新加坡先贤故事）”，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多元文化素养、双语能力及磨练翻译技巧。

这两天翻译营的活动精彩充实，学生们不仅能够从翻译领域专家的演讲中学习文化翻译与机械翻译的理论及技巧，同时还能通过小组实践活动结交朋友，学以致用。翻译实践活动让学生们翻译新加坡东西南北以先贤命名的街道以及这些先贤的事迹。每组则需要录制一个不超过2分钟的播客音频。

除此之外，各校还派出了翻译能力较强的学生参与中英互译比赛。各参与学校分别翻译了由《源》杂志提供的一篇中文文章和由国家文物局提供的一篇英文文章，最后评选出最优秀的中英文翻译作品。经过评审的评选，最终来自耘青中学的刘奕廷、詹淑云和蔡筱桐获得中译英比赛第一名；来自华侨中学的黄一航、黎新宇和段禹辰获得英译中比赛第一名。

我们将翻译营比赛的中英文原文和获奖作品刊登于《源》杂志，以此鼓励学生们努力掌握双语，同时也希望更多学生能关注本土华文刊物，提升阅读华文刊物的兴趣。

各小组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翻译与制作不同新加坡地标的播客音频



新加坡社科大学李六公博士做主题演讲：《人工智能、文化、翻译》



代表数码发展与新闻部翻译处的谢丽芳女士与同学们分享本地的翻译资源



南洋理工大学崔峰博士做主题演讲：《本土文化翻译策略与技巧》

林谋盛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文图 · 王顺明

麦里芝蓄水池公园一隅的山坡上有座土灰色的墓冢，这里环境异常清幽，只闻鸟语与花香，靠近墓冢一看，见墓碑上镌刻着11个大字——陆军少将林烈士谋盛之墓。

关于林谋盛

林谋盛（1909-1944）生于中国福建南安，幼时在厦门接受教育，16岁南来新加坡，毕业于莱佛士书院及香港大学。父亲是名成功的商人，在中国与新加坡的家资相当丰厚，于中新马三地

华侨商人社群中享有盛誉。

林谋盛20多岁时父亲就过世，他继承了林氏的家业，同时又担任中华总商会董事，是当时新马华人社会里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林谋盛很早就成家立室，他与妻子育有四子四女。此时的林谋盛应当是家庭事业两得意。

当仁不让的奉献精神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林谋盛一直热心资助各项援华抗日的运动。随着战火延烧



林谋盛肖像



林谋盛之墓

至马来亚，他不但出钱还出力，更奋身抗日前沿。1942年新加坡沦陷，他忍痛留下妻儿远赴印度，在那里负责训练中国留印海员；与此同时，他也经常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两地并多次参加中英盟军的战略会议。而后，他被调任盟军东南亚总司令部第136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负责侦察和情报收集的工作。

1943年11月，林谋盛不认同僚在 frontline 抗争，自己却只能在后方统筹，于是，他决定身先士卒，孤身潜回马来亚霹雳州以策应当地抗日部队的工作。1944年3月，他不幸被查哨站的日军识破身份而遭逮捕，日本宪兵在狱中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肯屈服，并没供出队友的行踪及部队的情报。在连月的酷刑逼供下，林谋盛于1944年6月29日殉难，年仅35岁。

二战结束后，林谋盛的家人赴华都牙也将他的遗骸运回新加坡。1946年1月，英军在政府大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军葬礼，中国国民政府亦追赠林谋盛少将的军阶，随后，林谋盛的灵柩迁至麦里芝蓄水池入葬。数年后，英殖民政府批准了在滨海公园为林谋盛建立一座纪念塔，宝塔的设

计结合了中西元素，塔身嵌有铜匾记述他的生平事迹，给大家了解他传奇的一生。国家文物局于2010年12月将林谋盛纪念塔列为国家古迹。

爱国与互助的精神

林谋盛既灿烂又悲壮、短暂却传奇的一生让我对他肃然生敬，同时我也不断反思他到底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从林谋盛身上，我们看到了华族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品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继承林谋盛的爱国护家的精神，坚决捍卫这片孕育并滋养我们的土地。

在那个动荡不安时代的华族群体间有很强的互助精神。当中日战争爆发后，包括新马在内的各地华人社会，都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战事业；出钱出力，体现了华人守望相助、齐心协力的强大凝聚力。时过境迁，新加坡已经是个独立且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已经熔铸了属于自己、具本土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但互相扶持、彼此关照的传统精神依然在社会各个阶层有所体现，我们应当守护并延续这难能可贵的精神。

（作者为旅游业者、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THE SPIRITUAL LEGACY LEFT BY LIM BO SENG

Author: Ong Soon Meng

On a secluded hillside within MacRitchie Reservoir Park lies a soil-gray tomb, surrounded by an extraordinarily tranquil environment where only the sounds of birds and the scent of flowers fill the air. Upon closer inspection of the tombstone, one can see 11 large characters inscribed: "Tomb of Martyr Major General Lim Bo Seng."

About Mr Lim Bo Seng

Lim Bo Seng (1909-1944) was born in Lam Ann (Nan'an), Fujian Province, China. As a child, he received his education in Xiamen and, at the age of 16, came to Singapore, where he graduated from Raffles Institut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father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with considerable wealth in both China and Singapore and was highly regarded within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Chin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his twenties, after his father's passing, Lim Bo Seng inherited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also served as a directo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e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young tal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t that time. Lim Bo Seng got married early, and he and his wife had four sons and four daughters. At this point in his life, he was likely enjoying both family happiness and career success.

Dedication of being benevolent

After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Sino-



英雄事迹永流传

Japanese War in 1937, Lim Bo Seng became deeply involved in various movements supporting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s the war spread to Malaya, he not only contributed financially but also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sistance. When Singapore fell in 1942, Lim made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leave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travel to India, whe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Chinese seamen in India. At the same time, he frequently travelled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n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strategic meetings of the Sino-British Allied Forces. Later,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head of Chinese section in Force 136, the British Southeast Asian Command, overseeing reconnaissance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n November 1943, unable to bear seeing his comrades fighting on the front lines while he was relegated to organising from the rear, Lim decided to take the lead and returned alone to Perak, Malaya, to assist the local anti-Japanese forces. In March 1944, he was unfortunately identified by Japanese soldiers at a checkpoint and was arrested.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subjected him to severe torture in prison, yet despite the brutal treatment, Lim never wavered and refused to divulge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s comrades' whereabouts or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forces. After enduring months of relentless torture, Lim Bo Seng died a martyr on June 29, 1944, at the young age of 35.

After World War II ended, Lim Bo Seng's family went to Batu Gajah to retrieve his remains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Singapore. In January 1946, the British military held a solemn military funeral for him at the Government House (now the Istana), and Kuomintang government of China (KMT) posthumously awarded him the rank of Major General. His remains were then reinterred at MacRitchie Reservoir. Several years later,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morial tower for Lim Bo Seng at Esplanade Park. The design of the tower incorporated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and the tower was inscribed with a bronze plaque detailing his life and achievements, allowing people to learn about his legendary life. In December 2010,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designated the Lim Bo Seng Memorial as a national monument.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mutual assistance

Lim Bo Seng's life, both brilliant and tragic, brief yet legendary, commands my deep respect. At the same time, it prompts me to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 lessons he left us. From Lim Bo Seng, we can see the noble qualiti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the belief that every citizen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their country's fate. We should inherit Lim Bo Seng's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protect the homeland, steadfastly defending the land that nurtures and sustains 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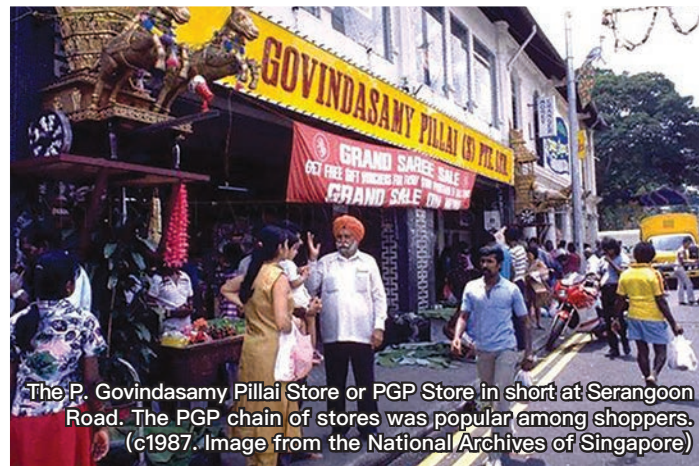
During that turbulent era, the Chinese community demonstrated a strong spirit of mutual suppor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including tho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rallied to support China's resistance efforts; they contributed both money and efforts, exemplifying the powerful cohesion and solida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ough times have changed, and Singapore is now an independent and highly developed nation, we have forged a distinct Singaporean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mutual support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remains evident across all levels of society, and we must cherish and continue this invaluable spirit.

(Translated by Low Yik Teng, Nicole Zhan Shuyun, Cai Xiaotong from Yuan Ching Secondary School, Winning entry of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ompetition)

P. GOVINDASAMY PILLAI

Courtesy of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t 18, P. Govindasamy Pillai ran away from home, boarding a ship in Tamil Nadu for Singapore. The early days were tough for Pillai as he struggled to find a job. When he was given the chance to work in a provision shop, Pillai wasted no time learning the ropes. Along the way he bought over the store and opened branches bearing his initials. In 1963, his business empire was valued at \$3 million.



The P. Govindasamy Pillai Store or PGP Store in short at Serangoon Road. The PGP chain of stores was popular among shoppers. (c1987. Image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starting before the break of dawn and ending only after midnight.

Fully immersed in the world of provision shop operations, Pillai picked up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needed to run the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In 1929, he borrowed \$2,000 to buy the store following the demise of its owner. It was a far-sighted move on the part of Pillai who had just gotten married. The lessons from his late employer were not forgotten and Pillai spent long hours fine-tuning and running the enterprise.

Humble beginnings

P. Govindasamy Pillai (1887-1980) was born in the village of Koorainadu in Tamil Nadu. He ran away from home in his teens and boarded a ship for Singapore, arriving in 1905 at the age of 18.

Pillai found life in Singapore tough. He struggled to find employment and with just 13 rupees to his name, was unable to afford food and lodging. His circumstances improved somewhat after a provision store owner at 50 Serangoon Road got him to work in exchange for food and board. Pillai's hours were punishing with work

Self-made millionair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his customers, Pillai began selling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ranging from canned goods to shoes. He also opened branches in Little India. People began associating the P. Govindasamy Pillai name, which his business was named after, with convenience.

Although the business day was long-work started at 7am and ended around 9pm-Pillai took care of his staff. They were given two-hour lunch breaks and lodging at his home.

Having found his stride, Pillai began setting

哥文达三美·比莱

文·国家文物局

十八岁那年，P·哥文达三美·比莱（P. Govindasamy Pillai）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登上一条船只，离开家乡，前往新加坡。因为苦于谋生，刚到新加坡的那段日子，比莱可谓举步维艰。当他终于谋求到一份在一家杂货店工作的机会时，比莱觉得“时不我待”，立刻分秒必争地勤奋钻研，渐渐摸清做生意的门路。在创业路上一路走来，他盘下店铺，开了很多家冠以他姓名首字母缩写的分店。1963年时，他的商业帝国估值已达300万新元。

aside money to invest in other ventures. He opened flour and spice mills, and started five saree shops. He also invested in properties in Serangoon Road, Race Course Road and Buffalo Road, and even managed to build houses in Little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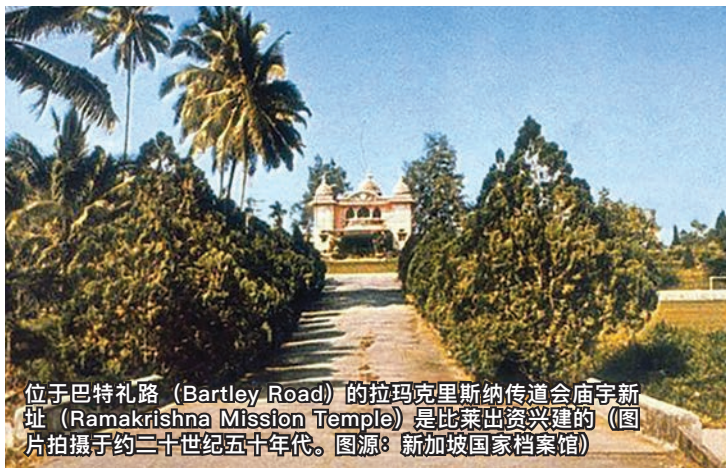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illai's family managed to escape unscathe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story for his propert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 Undeterred, Pillai began rebuilding his business empire, doing well enough to open PGP Stores in Malacca and Johor. By 1963, the year of his retirement, Pillai's business was valued at S\$3 million.

Pillai died at the ripe old age of 93 in 1980. In 1998, the PGP Stores, having chalked up huge debts, were shuttered.

Investing in the community

Pillai, having been impoverished for a good part of his life, made it a point to help others throughout his life. In 1952, he paid for a new home for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Singapore, an organization which renders aid to the needy. He also contributed generously to institutions such as Mount Alvernia Hospital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the 1970s, Pillai donated \$300,000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gopuram (entrance tower) for the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at Serangoon Road.



位于巴特礼路（Bartley Road）的拉玛克里斯纳传道会庙宇新址（Ramakrishna Mission Temple）是比莱出资兴建的（图片拍摄于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寒门贵子

哥文达三美·比莱 (P. Govindasamy Pillai) (1887-1980) 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一个名叫库莱纳杜 (Koorainadu) 的村庄里。十几岁的时候，他离开故土，登上了一艘开往新加坡的船只。1905年抵达新加坡时，比莱年仅18岁。

比莱觉得在新加坡的生活步履维艰，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地找工作，但因为仅有13卢比傍身，他食不果腹，连伙食费和住宿费都交不起。直到有一家位于实龙岗路 (Serangoon Road) 50号的杂货店店主愿意雇佣他，得以做工换取食宿时，他的窘境才稍稍有所改善。比莱的工作繁重不堪，工时很长，他每天从天不亮就开始干活儿，往往要披星戴月地干到半夜后才收工。

由于全身心地沉浸在经营杂货店的这方天地中，比莱迅速掌握了做生意所需要的各种门道和学问。1929年，店主去世后，比莱举债2000新元，盘下了那家店铺。对于彼时刚刚完婚的比莱而言，这个决定可谓是一个深具远见卓识之举。比莱也吸取了已故店主的种种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投入大量时间呕心沥血地精心经营着这家企业。

白手起家

为了给顾客提供便利，比莱的店铺售卖货品的种类更为多样化，从罐头到鞋履，不一而足。他在“小印度”也开设了分店。人们渐渐开始把 P. Govindasamy Pillai (PGP) 这个名字——也是冠以这个名字的店——和“便利”联系在一起。

尽管店铺的营业时间很长，从早上7点开业至晚上9点左右才打烊，比莱依然十分体恤员工。他的员工们享有长达2小时的午休时间，届时也可以在他家里休息。

在生意全面上轨道后，比莱开始将部分资金尝试投入到其他业务中。他开设了面粉和香料厂，还经营起五家“印度纱丽”店。此外，他还在实龙岗路 (Serangoon Road)、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 和巴弗罗路 (Buffalo Road) 投资了房产，甚至想法设法在“小印度”修房盖屋。

在日占时期，虽然比莱一家侥幸地劫后余生、毫发无损，但他的万贯家财却在战争中毁于一旦。面对痛失家产之殇，比莱没有被吓倒，他重整旗鼓，着手重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经营得有声有色，甚至将他的“PGP商店”开到了远至马六甲 (Malacca) 和柔佛州 (Johor) 的地界。截至1963年比莱退休时，他的企业估值高达300万新元。

比莱于1980年高龄辞世，享年93岁。1998年，“PGP商店”因欠下巨额债务而结束营业。

回馈社群

由于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贫困，因此比莱终其一生都以助人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1952年，他出资兴建了新加坡拉玛克里斯纳传道会 (Ramakrishna Mission Singapore) 新址，该传道会是一个专门致力于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的组织。他也为一些机构慷慨解囊，比如为圣婴女修道院医院 (Mount Alvernia Hospital) 和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等捐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比莱捐资30万新元，兴建位于实龙岗路 (Serangoon Road) 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庙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的新“庙塔” (入口处装饰塔)。

(本文为翻译比赛英译中获奖作品，由华侨中学黄一航、黎新宇、段禹辰翻译)

阳光、大海和沙滩为伴的



文图 · 李国樑

马

林百列 (Marine Parade) 是本地第一个兴建在“海上”的市镇，2万多人安居在7000多户组屋单位。第一代居民向往高楼看海的日子：但见商船熙熙攘攘，风和日丽时可眺望廖内群岛。公共楼房竟然有海景，以阳光、大海和沙滩为伴，确实似梦寐以求的“度假”胜地。

第一代居民的喜乐与哀愁

马林百列初发展的时候，建屋发展局把这块福地规划为半郊区，三房式组屋售价1万多元，四房式2万元，五房式3万多元，如今看来仿佛捡到宝。1974年3月第一批组屋落成，由国会议员现场抽签配售。居民迁入新家，住上没几年窗户框架铁锈一片片剥落，原来普通钢铁经不起海风腐蚀，建屋局改用防锈材料后，终于把问题解决。

对于第一代居民来说，最便利的就是缺少公共设施。那是因为新市镇分两期发展，第一期着重于兴建房屋，第二期才发展邻里商店、小

贩中心、诊疗所、邮政局、百汇广场等设施。出行方面，居民必须走到东海岸路 (East Coast Road) 搭乘公交，过了一年多巴士才开进组屋区。上世纪80年代兴建地铁，30多年后汤东线来到马林百列和马林台 (Marine Terrace) 地铁站。马林台是第一批完工配售的组屋，如今见证地铁开通，可谓守得云开见月明。

填海大工程

马林百列是个狭长的填土地带，每座组屋都由深入岩石层的铁桩支撑。虽然苏门答腊发生强烈地震的时候，这里的高楼会轻微摇晃，但尚不足以影响结构安全。

新马合并当年，马林百列进行填土试点项目，面积约25个足球场。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启动正式填土建屋项目，传送带将勿洛 (Bedok) 和实乞纳 (Siglap) 地区的山土注入大海，不足的沙子则从国外采购。过了五年光景，勿洛至丹戎禺的海面上出现新陆地。

1972至1976年这几年间，但见填土地带高楼涌现。发展组屋期间，建屋发展局同时兴建海皇阁 (Neptune Court) 中等入息公寓 (简称 HUDC)，让收入较高的公务员申请。那个年代，



1. 欧亚人文化馆 Eurasian Heritage Gallery
2. 城市书房 City Book Room
3. 圣家堂 Church of the Holy Family
4. 圣伯特理中学 St Patrick's School
5.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学校 Sekolah Indonesia Singapura
6. 实乞纳甘榜回教堂 Masjid Kampung Siglap
7. 陈永义 (Tan Eng Ghee) 豪宅海墙
8. 极限滑轮公园 Xtreme Skatepark
9. 新加坡冲浪公园 Singapore Wake Park

10. 海皇阁 Neptune Court HUDC
11. 维多利亚中学 Victoria School
12. 加东圣婴女校 CHIJ Katong Convent
13. 马林台 Marine Terrace
14. 海风37号 Seabreeze No 37
15. 消失的振裕园 Mandalay Villa
16. 儿童乐园 Coastal PlayGrove
17. 百汇广场 Parkway Parade
18. 东海岸公园 East Coast Park

未来的长岛地带：由三块填海土地组成横跨东海岸公园的“岛链”
 马林百列地形图
 (根据2024年谷歌地图绘制)

马林百列

申请购买组屋者的月薪顶限为1500元，因此催生中等入息公寓，成为现代执行公寓（EC）的先行者。

从前的海岸线

从前马林百列海岸线地标包括中华游泳会、振裕园（Mandalay Villa）、甘榜安柏（马来乡村，现在的Amber Residences公寓）、海景酒店（现在的The Seaview公寓）、加东圣婴女校（CHIJ Katong Convent）、圣伯特理中学（St Patrick's School）等，如今这条昔日海岸线距离海滩越来越远。

马林百列路与纳乐路（Nallur Road）交界的实乞纳地铁站旁，尚未拆除的古老围墙建在从前的沙滩上，围墙背后曾经是陈六使公子陈永义（Tan Eng Ghee）的豪宅。新马合并时期，印尼特工多次在新马两地进行破坏，这道海墙被部分炸毁后重新修复。

振裕园浪漫笙歌

马林百列路和安柏路（Amber Road）交界的交通圈，是消失的安柏路29号振裕园所在地。振裕园原为李俊源（亦写成李浚源）与陈德娘

（李俊源夫人）的住家。陈德娘活动频繁：时常在家开派对、与陈秋娘（郑连德夫人）、李珠娘（本地第一位女医生）等创办华人妇女协会并担任会长、为华族助产妇提供奖学金、成立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Girls School）基金等。李俊源去世后，陈德娘继续以丈夫名义行善。

振裕园旁的甘榜安柏也是李家的产业，马来渔民为感谢李家提供免费土地让他们居住，曾在陈德娘的生日舞会表演助兴。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参加过振裕园的聚会，刻意带着女朋友避开人群，在别墅后面的沙滩求婚成功。原来交通圈原址不但曾高朋满座，还承载着慈善和浪漫情怀。

海风37号

昔日振裕园近邻是一栋门柱写着“Seabreeze No 37”（海风37号）的百年老屋，这座海滨平房建于1898年，是蔡金吉（Choa Kim Keat）家族世代相传的度假别墅。上世纪70年代填海造地之前，大门距离海边仅5米之遥。

原主人蔡金吉在马六甲出生，大巴窑的金吉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以推销锡矿起家，房产分布在马里士他、西班牙让、尼路和加东一带。日据时期，日本官员强占海风37号，战后归还给蔡氏家族。十多年前远东机构买下它，预计不久后这片半个足球场的土地将屹立起高级公寓，受保留的平房将纳入公寓设计中。

蔡金吉对胡姬花情有独钟，栽种的花卉频频



马林百列初发展时可见狭长的填土地带
(图源: HDB annual report 1972)



马林台是第一批完工配售的组屋，如今见证地铁开通



发展组屋期间，建屋发展局同时兴建
海皇阁公寓，让收入较高的公务员申请购买

获奖。英国皇室来新加坡访问，赠送给贵宾的花束来自他的花园。他于20世纪初去世后，留下1500多盆稀有花卉公开拍卖，其对园艺的热衷可见一斑。

麻雀虽小 名校云集

从前这一带以英校为主，圣伯特理中学和设在海边别墅内的加东圣婴女校乃其中两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新镇带动人口移动，分别由福建人和潮州人创办的道南学校和义安女校，从市区一带搬迁到马林百列，加东圣婴女校中学部和新创建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也在填土地带落户。

维多利亚初级学院的构想由维多利亚中学校友组成的咨询理事会提出，落成时已是本地第10所初院。后来维多利亚中学也搬迁至此，让学生原地升学。初院的概念源于新马合并期间，时任总理李光耀宣布建造一所特别中学，让本地的顶尖高材生接受最好的教育。社会人士认为政府提倡精英主义，塑造超级学生，因此产生许多负面情绪。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时任教育部长王邦文解释，建立初院是为了优化教师和实验室设施的使用，并且招收所有语文源流学生，促进各民族融合。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初院终于得到国人的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

20世纪初，一些欧亚人来到加东一带定居，创建圣伯特理中学和圣家堂（Church of the

Holy Family）。如今欧亚人协会的会所也在附近落户，会所内设立欧亚人文化馆，已故薛尔思总统的淡马锡勋章乃镇馆之宝之一，大家还可在会所内的餐馆享用传统欧亚人美食呢！

20多年前在原地重建的圣家堂，玫瑰花窗镶嵌着中世纪创作风格的彩绘玻璃，那是当代法国Vitrail Saint-Georges工作坊的作品。从1980年代开始，圣家堂在农历新年除夕夜为峇峇娘惹族群主持独特的午夜弥撒，女教徒身穿沙笼卡巴雅，男教徒则峇迪上衣长裤，出席简单肃穆，全程以峇峇马来语进行的贺年仪式。

冠病疫情管制期间，城市书房从市区的桥北中心搬迁到圣家堂附近的如切路。书房创办人陈婉菁来自怡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先后在出版社工作和书局任职。婉菁成立实体书店，坚持推广纸质书，决定物色新地点开发文化园地。祝福她的热忱能够开花结果。

甘榜风味的角落

马林百列路与实乞纳路交界处，有个马来风味浓厚的小区。现代化的实乞纳甘榜回教堂（Masjid Kampung Siglap）保留昔日的甘榜建筑风格，开办课程教导学生背诵《可兰经》的特别技巧，同时了解经文的故事和教义。

实乞纳甘榜回教堂的近邻，是一所爪哇风格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学校（Sekolah Indonesia Singapura, SIS），成立背景可追溯至新马合并与分家的年代。当时，印尼怀疑英国在背后指使

马林百列路与纳乐路交界，实乞纳地铁站旁的海墙



海风37号百年老屋，初落成时距离海边仅5米之遥

历史悠久的圣伯特理中学由欧亚人创建



实乞纳甘榜回教堂保留昔日的甘榜建筑风格



西马、东马和新加坡合并成为马来西亚，最终目的是并吞婆罗洲，因此产生武力对抗。对抗局面随着新加坡独立而告终，新加坡与印尼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SIS最初在荷兰村一带开课，学生主要是印尼大使馆官员的子女。两年后双方签订发展与合作条约，新加坡提供实乞纳地段让学校扩建，让SIS成为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直通车学校，开放给常驻新加坡的印尼公民。

极限运动的体育精神

如今有不少青少年，甚至乐龄人士通过极限运动与户外探险来挑战自我。虽然最初参加极限运动的人士以男性居多，但现在有越来越多女性踊跃参与。攀岩是当下较普遍的极限运动，一些学校和百货商场都有相关设施。高端的极限运动跟传统球类活动、骑脚车、跑步、划龙舟等相比，勇气、风险和难度要求都高得多。

马林百列发展时期所建造的东海岸水上游乐场（Big Splash）是本地极限运动的前身，规模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约七层楼的滑水梯则全世界数一数二。这类活动再“极限”也毕竟有限。尤其是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军训等训练后，滑水梯已失去吸引力，原地由餐馆取代。如今再度转型为免费开放的儿童乐园（Coastal PlayGrove）。

至于全力打造的东海岸人工湖，面积相等于30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因太过安全而不受欢迎，最终成为专供缆绳滑水（CableSki）的

新加坡滑浪公园（Singapore Wake Park）。缆绳滑水指的是在固定的高塔之间架起缆绳，电动马达牵动滑手在水中滑行和进行各种花式动作。

东海岸极限滑轮公园（Xtreme Skatepark）则是滑板爱好者的天堂。它是亚洲地区少数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滑轮公园之一。平缓的斜坡、小型跳台和低矮台阶适合新手；3.6米深的垂直碗则让老手征服恐惧感，进一步挑战自己。

一些极限运动的项目已纳入奥运会和其他国际赛事。例如因冠病疫情而延迟一年举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众青少年选手参与滑板项目。不论得分或失手，选手均乐在其中，好像是场嘉年华，不像是争夺奖牌的比赛。极限运动形成一套互相勉励、尊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特殊价值观。

长岛：为保护未来家园再次排山倒海

随着气候变化，估计到了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上升一米，若同时遇上涨潮和风暴，海水可能覆盖沿海地区。未来几十年，东海岸水域将出现人造长岛（Long Island）来保护国人的家园。

初步构想的长岛，由三块填海土地组成横跨东海岸公园的“岛链”，即可缓解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威胁，也形成新的蓄水池，打造休闲设施、住宅和工业园区等。

一个甲子前，我们的先辈在东海岸展开填海工程，为后代创造居住空间和体验新生活的机



爪哇风格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学校



东海岸极限滑轮公园是滑板爱好者的天堂，也是亚洲地区少数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滑轮公园之一



从组屋高楼看海，商船熙熙攘攘
右方为从前的东海岸水上游乐场



新加坡滑浪公园，滑手由电动马达牵动在水中滑行

会。长岛规划则延伸前人未雨绸缪的精神，为百年后的老百姓挡风浪，让他们在美好的新加坡继续生活，追求梦想。

参考文献：

- [1] Alvin Chua, Marine Parade,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id=838f450b-0782-438d-8a7a-9daebb547fe2> accessed 18 February 2024.
- [2] Design and good planning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The Straits Times, 2 March 1984.
- [3] Kenneth Goh, Yaohan (Singapore),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id=fe3da275-a2ca-448a-b766-68246bdf855d> accessed 19 February 2024.
- [4] "Lee Plans a Super Eton-Style Boarding School," Straits Times, 3 May 1965.
- [5] Mandalay Villa,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id=c154c428-174c-48b1-84e2-76b2b074b371> accessed 21 February 2024.
- [6] Marine Parade Sea Breeze Lodge, Remember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marine-parade-sea-breeze-lodge/accessed> 11 March 2024.
- [7] Shabana Begum, Reclaimed from the sea: How East Coast and Marine Parade came to be, The Straits Times 28 November 2023.
- [8] Singapore. Parliament, Budget,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s. 467-469, 1965.
- [9] The Marine Parade public housing estate, <https://www.roots.gov.sg/Collection-Landing/listing/1189586> accessed 18 February 2024.
- [10] 幼吾，“园艺家蔡金吉”，《联合早报》2024年9月9日。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Marine Parade: Living by The Sun, The Sea and The Sand

Marine Parade is distinctive as the first Singapore town built "on the sea", housing over 20,000 residents in more than 7,000 HDB flats. The initial residents cherished their high-rise living with the panoramic sea views, including glimpses of the Riau Archipelago on clear days. With the sun, sea, and sand as their companions, it was like settling down in a dream "resort".

Marine Parade was mapped out as a semi-suburban zone under the HDB plan. The first batch of flats, completed in 1974, was offered to applicants at prices that seem like a treasure trove today: three-room units were priced at about \$10,000, four-room units at about \$20,000 and five-room units at about \$30,000.

The early residents faced significant inconveniences due to the lack of public facilities. Looking back, the town's development wa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focused on housing construction, while the second added facilities such as hawkers centre, coffee shops, clinics, retail shops, post office, library and the iconic Parkway Parade.

Initially, residents had to walk to East Coast Road to take public buses. It took more than a year before they enjoyed bus rides near their doorsteps. Currently, the estate is served by two MRT stations, Marine Parade and Marine Terrace stations, along the new Thomson-East Coast Line,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the first trains began operating. Marine Terrace was among the first HDB flats completed in the town.

Marine Parade is built on a narrow strip of reclaimed land, with each HDB block supported by steel piles driven deep into the rock layer. Although the buildings may sway slightly during strong earthquakes in Sumatra, they are deemed structurally safe.

During the merger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pilot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was initiated along the East Coast, covering an area equivalent to 25 football fields. Following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th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went into full swing. Soil from nearby Bedok and Siglap hills was transported into the sea via conveyor belts, supplemented by sand purchased from overseas. After five years, a visible piece of land emerged from the sea stretching from Bedok to Tanjong Rhu.

Between 1972 and 1976, high-rise buildings were constructed on the reclaimed land. The HDB also constructed Neptune Court HUDC to provide housing catered for civil servants with higher income. These HUDCs were the precursors to today's Executive Condominiums (EC), as the monthly salary to apply for HDB flats was capped at \$1,500 at that time.

The reclaimed East Coast Park has shifted the original coastline far and away from the seaside. It has become a hub for extreme sports over time. For instance, the Xtreme Skatepark is a skateboarder's paradise. It is one of the few skateparks in Asia that mee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andards. It features gentle slopes and low steps that are perfect for beginners, while the 3.6-metre depth vertical bowl offers seasoned skaters the chance to conquer their fears and push their limits.

In the past, coastal landmarks including the Chinese Swimming Club, Kampung Amber (current Amber Residences), Sea View Hotel (currently The Seaview [Condominium]), CHIJ Katong Convent and St Patrick's School dotted the shoreline. An old seawall stands adjacent to the Siglap MRT on Marine Parade Road. Behind this was once where the grand mansion of Tan Eng Ghee, son of Tan Lark Sye loc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t is projected that sea levels will rise by a meter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potentially inundating coastal areas if weather conditions worsen. In the coming decades, a man-made Long Island will emerge from the waters of the East Coast to protect our home from seawater. This Long Island will feature a new reservoi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housing, and industrial parks across the "new" East Coast Park.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oastline will be extended further.

60 years ago, our forefathers managed to build Marine Parade on the land reclaimed from the sea, thus creating living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descendants. Long Island continues this legacy, planning for future challenges and ensuring a better Singapore for many generations.

好戏连场 乡音动听



文·葛新

图·王绥良 王彩晖

对 新加坡三江梨园社与无锡市剧协越剧分会联合打造的“越剧流派艺术展演之2024说文解戏”，于2024年9月28日晚假淡滨尼天地佳节艺术剧场呈献给本地戏迷。此次表演的剧目由《盘妻索妻·洞房》《打金枝·闯宫》《梁祝·楼台会》《盘夫索夫·后盘夫》《窦娥冤·斩娥》以及《红楼梦·黛玉葬花》这六出越剧片段组成。经典的名剧名段表演，让观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

说文解戏 演评结合

越剧也被称作“才子佳人”戏，起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昆曲、话剧等剧种的特色。它以抒情见长，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灵秀之气。越剧的经典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都是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此次演出的形式非常特别，刻意安排了两位讲评人，在每段折子戏开场间隔，讲解和评说该剧目的背景、内容、唱腔、流派，以及扮演者的基本资料。讲评人一位是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蘧，另一位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陈敏。一个诙谐幽默，一个地道专业，两人你来我往、配合默契，让观众在笑声中轻松地了解到剧情以及与越剧相关的知识，很好地配合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说文解戏。

两位讲评人在介绍剧目片段的对话中不时有金句爆出。

当陈敏介绍第一出戏的《盘妻索妻·洞房》中男主梁玉书是一位完美的暖男时，李秉蘧接话说：“听说很多戏迷都说‘嫁人当嫁梁玉书’”。而演这一段的两位主角是第一次挑大梁的三江梨园的新人方智娴和胡春燕。但从她们的表现来看却是一点也不怯场，观众们随着她们的唱作而完全融入了剧情。

第二出戏是《打金枝·闯宫》。陈敏说：“他们可不是普通夫妻啊”。李秉蘧接话：“君蕊公主和郭暧驸马吵架”。陈敏老师介绍道：“《打金枝》最经典的版本是由范瑞娟老师和吕瑞英老师共同演绎的。而此次演出是由来自无锡张惠芳



李秉蘧（左）和陈敏（右）的讲评
一个诙谐幽默，一个地道专业

和竺慧丽两位专业演员担纲，精彩程度自然不必多言。”

第三出戏是《梁祝·楼台会》。李秉蘧介绍：“这段唱腔体现了越剧唱词的特色：通俗、流畅、抒情、达意。虽说是梁祝，可是这段戏却由三江梨园社的陈卉玲一人表演。着重表现祝英台的聪慧以及对梁山伯的深情。”

第四出戏是《盘夫索夫·后盘夫》。陈敏介绍说：“《盘妻索妻》是受到《盘夫索夫》的启发而创作的。”这段戏由无锡来的鲍秀君加盟本来是很精彩的，可惜演出到中途音响突然出现故障，只见演员嘴在动却没有声。鲍秀君不愧是资深票友，临危不乱，仿佛没事发生。剧场工作人员手持麦克风上前去救场，观众响起掌声。鲍秀君一下水袖甩出，巧妙地拒绝了手提麦，仿佛戏中的一幕，再次得到观众的热烈掌声。

第五出戏是《窦娥冤·斩娥》。李秉蘧介绍道：“这出戏改编自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为中国四大古典悲剧之一。”陈敏补充说：“演员将舞动两米长水袖，写意化地表现拷住窦娥的两条铁链，呈现窦娥临刑前内心的悲愤与抗争。”三江梨园社的胡春燕再次上场。只见她一袭红白相间的罪服，象征锁链的水袖看着不止两米。虽说是新人，舞起水袖来毫无破绽。

《黛玉葬花》压轴 再现越剧经典

本场的压轴戏是《红楼梦·黛玉葬花》。由三江梨园社社长李丰和中国国家一级演员竺慧丽领衔出演。两位分别饰演林黛玉和贾宝玉。

1958年，越剧《红楼梦》首演于舞台。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徐玉兰饰宝玉，王文娟饰黛玉，随即轰动了海内外。观众不但被故事情节所打动，更为两位优秀演员的精湛表演和优美唱腔所折服。王文娟的林黛玉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徐玉兰、王文娟也曾到新加坡访问演出过，相信有些老观众还记忆犹新。王文娟早年师从越剧表演艺术家支兰芳，打下了扎实的表演基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她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最终创立了“王派”唱腔。徐玉兰早年师从越剧表演艺术家施银花。施银花是越剧界的著名演员，对徐玉兰的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施银花的指导下，徐玉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

格，并最终创立了“徐派”艺术。

此次的压轴戏《红楼梦·黛玉葬花》，故事讲述林黛玉在怡红院吃了闭门羹后，心生误会，从而触动了她寄人篱下的悲凉心境。花落时节，黛玉触景生情，凄凄楚楚，边葬花，边留泪。宝玉见到葬花的黛玉，试图给予劝慰。该表演让观众在短短的一个折子戏片段里，就可以领略到王派和徐派两派的唱腔，让观众大饱耳福。

李丰不愧为新加坡戏曲学院胡姬花奖和全球越迷嘉年华兰花奖获得者。她在诠释角色方面有独到之处。从她款款出场到幽幽葬花，无论动作、身形、唱腔，一举一动，一颦一叹，无不透析出角色的性格和内心。其唱功也了得，唱、作、念一气呵成，浑然一体。

竺慧丽则不愧为国家一级演员，专业水准极高。不出场则已，一出场便帅气逼人。正如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她的唱腔与表演融为一体，使现场的越剧迷看得差点忘了拍手叫好。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举办越剧讲座 推广越剧艺术

三江梨园社不失时机地在第二天举办了越剧艺术讲座，向大众推广越剧艺术的同时，也强化了团队的专业追求。笔者听了竺慧丽老师的讲座，了解到她来自于越剧世家，而且是越剧“原乡”。她将越剧的初创、成形、发展，以及流派的形成与扩展等一一道来。并系统而生动地演绎出各种不同流派唱腔的特点与变化，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三江会馆李秉蘧会长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乡音的追寻必然是要跨出所有的疆域极限和国界。根魂的探索一定会与祖宗十八代宗族血脉相联。”

越剧是三江人（浙江、江苏、江西）的家乡戏，因此由三江会馆所属的三江梨园社牵头是十分自然和贴切的。通过此次的演出及活动，使得新中两国越剧迷得到了一次绝佳的学习交流机会；既让三江人得到了一次视觉和听觉上的满足，也解了三江人渴望聆听乡音之愁。

题图说明：

胡春燕虽说是新人，舞起水袖来毫无破绽

（作者为本地越剧爱好者）



《盘妻索妻·洞房》中，第一次挑大梁的三江梨园的新人方智娴（右）和胡春燕（左）毫不怯场



《打金枝·闯宫》由来自无锡的张惠芳（左）和竺慧丽（右）两位专业演员担纲



无锡来的鲍秀君（右）加盟呈献《盘夫索夫·后盘夫》



《梁祝·楼台会》由三江梨园社的陈卉玲一人表演



《红楼梦·黛玉葬花》由三江梨园社社长李丰（右）和中国国家一级演员竺慧丽（左）领衔出演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 耕耘与赓续

“新华文化”专题完结篇

文·张森林

要 回溯新加坡华族文化最初的源头，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华人移民在新加坡剧增的原因。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指出：“随着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把大量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更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也开始了他们‘开发’殖民地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东南亚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开辟，烟草的种植，香料的栽培，还有城市、码头、港口、道路的大量建设，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都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因此东南亚的华侨居民人数剧增。”可见华人移民之所以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剧增，主要是出于经济与建设基础设施的考量。

根据此书的图表，1821年，新加坡总人口为4727人，华侨1159人；1901年，新加坡总人口22万8804人，华侨16万4681人。换句话说，经过80年的岁月变迁，新加坡总人口增长47余倍，华侨人口激增141余倍，从原来占总人口约24.5%到后来的约72%。我们有理由推断，新加坡华族人口后来持续高居新加坡总人口七成以上，应是始于123年前。既然是如此高比例的族群，其族群文化的衍生与演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概念的衍生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初为庆祝建国25周年而举办的“华族文

化月”。当时的23个联办机构，除社会发展部、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人民协会和国家剧场信託局是官方组织外，其余19个组织皆为民间团体。1991年开始，华族文化月改名为“华族文化节”。

1995年12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为华族文化节主持开幕仪式时，赞扬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族文化教育团体和宗乡会馆积极筹备常年华族文化节：“在殖民地时代，尽管没有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支持，这些团体还是能够在新加坡保存华族文化和语言。独立之后，这些团体继续在新加坡的社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团体的努力，华族文化节是不可能举办的。”

2004年10月，刚接过国家领导棒子的李显龙总理在一场华社晚宴上重申：“华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新加坡整体文化遗产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本质上是个亚洲社会，不是西方社会。新加坡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人民保留了勤俭节约和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

李显龙在两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肯定了华社对于保存华族文化所做的贡献，一方面也显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是来自民间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扮演桥梁和引导的角色。

确定性与未确定性

《源》杂志从2023年12月的第166期开始，至2024年10月的第171期，推出了“新华文化”专题，连续发表了六篇关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其顺序为：郭振羽教授《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刘太格博士《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拙文《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四个关键词》、蔡志礼博士《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纪赟副教授《在地化与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蔡曙鹏博士《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在这些论述中，作者从不同视角探索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建构、性质、形态与价值。郭振羽的《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环绕着“中心”与“新土”的角度展开论述。他认为：“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文化中华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其文化内涵。”此外，郭文以南洋画派与七月歌台为例，阐述现阶段新加坡华族文化的

两面：一面是未确定性，一面是确定性。

在未确定性的层面上，郭文提及：“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画派’或‘南洋风’视为专有。马六甲方面强势争取以‘南洋画派传承人’自居，看来南洋画派‘身世’之谜，一时还难厘清。当年新马一家，同属马来亚；如今新马分家，各自为政，也只能和马来西亚共戴‘南洋’一冠了。”

关于南洋画派新马不分这一点，我认为与新加坡建国之前的“马华文学”也是新马不分有几分相像。很多学者认为，从1919年到1965年，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是以连体婴的方式存在着的，任何企图把连体婴强行分开的做法，都可能遭到诟病。

然而，诟病归诟病，如果新华文学的源头不与马华文学切割，那么，这前46年的新华文学史将继续“被涵盖”在马华文学的论述之下。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将从2025年开始，把开办已十年的《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专题》和《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专题》这两门课改成《新加坡现代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现代华文文学》，显现这方面的切割需要破釜沉舟的论述决心与文化自信。

在确定性的层面上，郭振羽引述了2023年6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曾玲教授应新社科大之邀，发表题为《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的专题演讲。郭振羽认为，曾玲分析新加坡华社盛大举办“庆赞中元”的节庆背景和文化意义，可作为新加坡独特华族文化的实例。

曾玲分析中元节在新土的文化创造为原乡所无，而在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提供重要功能。此创造集中在三个特色：一是中元会成为常年主办庆赞中元活动的非正式组织，二是酬神方式从传统的酬神戏逐渐转换为娱乐大众的中元歌台，三是标福物。

然而，曾玲对新加坡华社的近距离观察与研究成果，却与曾在2014年于南洋理工大学访学的另一中国学者彭慧博士的观察结果大相径庭。彭慧在发表于《世界民族》2015年第五期一篇题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建构与彷徨——以新谣运动与七月歌台为例》的论文中，表达了她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建构的质疑。

此外，2018年，在彭慧的指导下，华中师范

大学硕士生杨亚红完成毕业论文《新加坡建国后华族文化发展的困境——以国家和社会二重视角的考察》的书写。杨亚红在此文中展现了她与彭慧“师徒同论”的特点：“建国后政府以国族建构的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对华族文化进行指导，包括华文教育等对华社发展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让华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许文化‘迷失感’；另一方面，华社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作出自己的应对，民众态度从颇多争议到积极调适，呈现出华族顺应国族建构、国家发展的大局意识。”

国际友人对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与价值观的正面观察、研究与解读，可激励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之，国际友人对此的误读与不甚理解，只要立论中肯，理据充分，也可作为砥砺我们前行的磨刀石。

建立文化自信

刘太格在《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一文中，强调了建立文化自信与族群融合的重要性：“新加坡华人须要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文化价值，以确保和确立我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同时，华人也必须认真维护和加深认知其他种族的传统文化。这不但能保证各族之间和谐相处，也能提升新加坡人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明确性。”

与此同时，刘太格也担心，以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而言，我们是否能真正担当得起“新加坡华族文化”之重：“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确应该要以中华文化为主轴，而同时融入新加坡本地的有特色的文化。要做好这件事，我担心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华人的语言水平，以及对中华文化历史的认知不够；其二，新加坡华人的价值观，其倾向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虽然我们已经独立自主了59年，我经常自问，新加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时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刘太格认为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在阅读刘文时，我联想到新华诗人郑景祥一首极具嘲讽意味的诗《殖民地现象》最后三行所要表达的意思：时序已经来到21世纪，而我们的潜意识始终没有独立，还在重复扮演忠诚的殖民地！没错，国人的心智首先需要“去殖民化”，才能摆脱殖民主义框架下的历史叙述，把曾被颠覆的历史加以还原。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

根据文化学者杜南发为2016年1月的“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一文的论述框架，以及我在2023年2月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一文的补充论述，如果说新加坡华族文化包含了中华文化、移民文化与国家文化三根支柱，相信没人会质疑。

拙文《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四个关键词》尝试从文化承袭、历史赅续、母语教育、新华文学这四个面向，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部分内涵。除此之外，新加坡华族文化还有其他许多面向，例如：语文探索、美学建设、戏剧影视、媒体生态、民间研究等。无论是哪一个面向，继承、承袭与赅续，始终是重中之重。

拙文强调：“新加坡华族文化是衍生自这片土地，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但不全盘照收的一种带有本土特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既然如此，跨族交融就显得越发重要。

谈到跨族文化交融，蔡曙鹏在《翻译与双语话剧：以南洋女中的〈茉莉公主〉和〈马兰花〉为例》一文中的论述，或许可为注脚：“翻译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与思想，而双语话剧则是这座桥梁上的灵动舞者。在舞台的光影交织中，语言如丝线般交错，将两种文化的精髓编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

保留文化之根

前述刘太格所担心的，以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而言，是否能真正担当得起“新加坡华族文化”之重，与郭振羽结语中所指出的：“目前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当今华语华文水平的低落，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保留文化之根”，两者对新加坡的华语文水平恐难堪重任的思考，不谋而合。

蔡志礼的《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全文以华语文的学习与文化的关系之讨论为基调，也对新加坡华语文水平低落表示担忧：“虽经官方与民间不断努力抢救，但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华语文水平始终提不上来的困境，令关心中华语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忧心忡忡。过去随着华语文水平和使用率

的下滑，中华文化在岛国式微成了无可幸免的下场，恶性循环的结果加上西风的吹袭和日韩雨水的浇淋，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颓势，任谁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蔡志礼认为，华语文水平、讲祖籍方言能力、文化认同取向、教育源流背景、宗教派别信仰、籍贯习俗和文化价值观的奉行等，是探测新加坡华族文化基因的要素；“只因为在赤道边缘长期曝露在欧美雨水、日光和韩风的结果，部分遗传基因产生突变，思想行为自然也有所变异”。

两种视角的不同映射

身为一名新移民，纪赉的《在地化与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经由“在地视角”与“国际视角”探讨形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历史成因，具有恢弘的历史观；其对新加坡这个岛国的纵深认识与层次分明的历史论述，远在许多国人之上。

经过长期的近距离观察，纪赉了解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得力于华人有意识“非华化”与“华化”两股相反力量的相互抗衡：

“第一，是为了适应本土的马来、印度、欧亚以及其他外来因素而不断改变的华人性。无论是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还是到经济、政治与其他更深层面，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都是不断在地化与‘非华化’的产物。

第二，自我有意识的‘华化’。这个要素的推动力，除了民族自豪、帮群与各种社团有意推动之外，最近数十年中又受到了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运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不良倾向’的文化侵蚀方面，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基于此，纪赉归纳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在长期的在地化过程之中，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然与中华文化乃至华南沿海文化有着不少差异。……另一方面，新加坡华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长期影响。新加坡无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华地区所未具备的开放性（香港、澳门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就会首先影响本地华族文化的生态。”

整体而言，在纪赉的认知中，相对于中华文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的移民文化与国家文化特色更为显著。

艺术求索是漫漫长路

蔡曙鹏的《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以新华舞台表演艺术为视角，从母体文化资源转化为本土艺术创造力、官办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会馆和人民协会为舞台艺术添彩、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注入动力等层面，涵盖其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观察。这几个剖析层面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母体与本土、官办与民办、新移民。

此文带领读者回溯至1940年代新加坡舞台表演艺术的岁月，由于是作者结合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其涵盖面之广，实践性之深，资料性之丰富，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阅读此文的同时，我不期然地联想到《典妻》。2024年5月8日，在出席“华彩2024”开幕礼时，我观赏了南华潮剧社呈献的潮剧《典妻》。对于地方戏曲，原本抱着“不妨一看”的心态，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剧场震撼之后，《典妻》颠覆了我对地方戏的陈旧看法。

该剧将舞美设计、灯光、多媒体与圆形转台有机糅合，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此外，吕岩导演在编曲配器上加入以管弦乐器为主的现代音乐元素，突破了传统潮剧从头到尾敲锣打鼓、锣鼓喧天的刺耳与轰鸣感觉，让观众得以享受融汇潮剧音韵之美与西洋乐器旋律之美的听觉饕宴。

《典妻》的成功现代化，是新加坡传统戏曲改革与转型漫漫长路上的里程碑，其启示有四：第一、通过艺术革新，大胆地去芜存菁，加入现代化元素，传统潮剧的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第二、结合新加坡与中国优秀演职人员的资源，能碰撞出效果甚佳的潮剧表演。这两点可资其他剧种或剧团酌情借鉴。第三、通过陈伟恬的担纲演出，以及金话筒学习中心4岁至14岁的更年轻演员的表现，宣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后继有人的事实。第四、由于需要阅读华文唱本，不同方言剧种的传统戏曲是学习华语文的有效途径。

华语文研究与文物保存

正当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涵渐渐形塑之际，我尝试从耕耘与赅续的角度，结合一些华文教学研究与文物保存的实例，对当下华族文化的情况做一简略讨论与报告。

华文教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核部分，根据统计，二战前后，新加坡的华校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1950年代的顶峰时期，主要由宗

乡会馆和教会开办的华校超过280所。有华文教学就会有华语文研究的需要，1960年代初周淑淑编的《华语注音符号》，196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总表》，1977年谢世涯的《简体字应用文论集》等书，均在此例。

成立于1951年的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从1975年至2015年，40年内出版了40期以华文教学为主要探讨对象的《中教学报》。第40期主编杜珠成在告别读者的《编后话》中说，40期有超过百位作者参与耕耘，他们多数从事教学工作 and 研究，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学讲师等，论文所涵盖的内容有教学法、教材、作业、文学、翻译等。

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从1994年至2020年的26年间，出版了十集《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编辑人员从资深的谢泽文、卢绍昌、梁春芳，过渡到较为年轻的胡月宝博士、钟国荣博士、陈家骏博士等；作者都是从事语文行政、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收录的论文分为语言教学理论、教学与教学法、语文测试等类。

无论是《中教学报》还是《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都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在华文教育领域所凝聚的宝贵资产。可惜的是，由于出版经费不足，《中教学报》在2015年出版第40期后停刊。

1990年代初期，胡月宝创作了微型小说《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通过一位不谙中华文化的华族子弟糊里糊涂地把家中价值不菲的画作《贵妃醉酒图》送给日本客户作为商场人情的故事，揭示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艺术的一无所知。

胡月宝笔下的虚构故事，不久后就出现在现实生活中。1990年代中期，某宗乡会馆由于在书画保存方面不够用心，年轻座办差一点就误把收藏三四十年的40余幅书画当成垃圾扔掉，幸好被一位“识货”的会馆理事及时发现，把那些书画——其中一幅是中国国画大师赠予该会馆的价值连城的画作——从垃圾堆中捡回来，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文物是华人移民史的重要见证，有关这一点，文史研究者符懋谦博士在其《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一文（2023年6月《源》杂志第163期）中，已有详细说明。对文物的缜密鉴定、还原修复与完善保存，也是新加坡华族文

化在这个领域渐趋成熟的表征。2012年，作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的策展人，杜南发指出，希望通过这项巨大投入且具开拓性文化意义的展览，能加强传统社团保护和善用文物的教育意识，也让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精神有新的体认。

例如，始建于1828年或更早、坐落在惹兰红山石叻路的福建人古寺庙恒山亭，1992年遭遇火灾，两年后，其遗址因土地征用而拆除。一副拥有近200年历史的恒山亭古庙楹联，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流失后，在2022年从美国被送回新加坡。失而复得，福建会馆负责人如获至宝。

再如，始建于1835年或更早、1880年重建于劳明达街与加冷路交界处的广肇人古寺庙广福古庙，1979年因土地征用而拆除，包括古庙一面百年牌匾在内的诸多文物移交到广惠肇碧山亭地库存放30多年后，2023年年中，在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副主任庾潍诚博士的整理与鉴定下，重见天日。

文物与垃圾仅一线之差。在庾潍诚那次所拯救的文物中，以广福学校的《学籍总册》和数本广福校刊最为珍贵。他在2023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陈爱薇专访时表示：“这不仅是一所学校或一座庙的历史，更是华社的珍贵资产，一个时代的印证，反映广东社群办学育人的精神。”

因着这个发现，在2023年11月中旬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吉隆坡世界华文教育论坛上，庾潍诚以新社科大中文系客座讲师的身份，发表题为《新加坡广福学校（1916-1982）〈学籍总册〉等一批珍贵档案发现始末及其意义》的研究报告，从广福古庙所遗留的文物谈到其所兴建的广福学校。

唯拯救文物的道路崎岖难行。庾潍诚在上述访谈中表示，自己年近半百，恐力有不逮，呼吁有共识的年轻人站出来，一起接续新加坡文物鉴定的未竟使命。

早自2023年2月中旬开始，庾潍诚便把广惠肇碧山亭所收藏的百年墓葬文物，通过在《新明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墓葬笔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物对华人移民史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广义的文物包括建筑物。竣工于1950年代中期的前南洋大学校园，其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负责人是英年早逝的黄庆祥。目前任教于新加

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陈煜博士，曾在2010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上，以《南洋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为题，探讨鲜为人知的南大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解读筹建委员会所代表的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建设海外华文大学的理念，以及其对华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理解等。

陈煜当年在国大执教时的研究助理是建筑系本科生陆国豪。后者除协助陈煜收集南大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资料外，也协助陈煜收集黄庆祥在新加坡的早期建筑设计和进行相关的文字翻译等。

2001年至2004年，陆国豪在中正中学总校念初中；2009年至2014年，他在国大建筑系念本科和硕士学位。出于对古建筑修复工作的兴趣，陆国豪以中正总校的建筑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撰写本科毕业论文。2013年，在赖启健博士的指导以及诸多新华文史学者作家的协助下，其毕业论文《一所万人学生的中学的愿景：中正中学的历史发展（1939-1977）》（The Vision Of

A Middle School For 10,000 Students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1939-1977)）顺利完成，并获评为优等。

据知，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八零后的陆国豪需从以繁体字书写的卷帙浩繁历史文献中寻找所要的资料，然后转换成简体字，最后翻译成英文，工序繁杂。

2013年，中正总校为竹林楼和“中正中学”牌坊申请国家古迹，时任校长彭俊豪曾参考陆国豪的论文。后来，国家文物局人员找到陆国豪，参考其毕业论文以编写这两座建筑对人文历史的重要性。2014年，这两座建筑正式列为国家古迹。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端赖华族子弟的使命感。从新加坡几代人在构建华族文化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与坚持，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前赴后继的使命感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张森林，1961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客座讲师。著有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专题研究《砥砺前行：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发展之路》、学术论著《朝向环境伦理：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1976-2016）》等。编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新国风：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等。



精诚携手 共拓新程

黄循财总理兼财政部长欢迎晚宴

Welcome Dinner in Honour of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Lawrence Wong

29.11.2024



精诚携手 共拓新程

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办黄循财总理兼财政部长欢迎晚宴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简称“中华总商会”）于11月29日晚在新加坡乌节希尔顿酒店联手举办了“精诚携手·共拓新程——黄循财总理兼财政部长欢迎晚宴”。800位来自宗乡总会、中华总商会、各宗乡会馆、商团、华社自助理事会、华族文化中心、通商中国、和各大华社组织的代表以及合作伙伴，齐聚一堂，祝贺黄循财先生出任我国第四任总理。

团结一致 共拓新程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中回顾了黄循财总理与华社的渊源。他特别提到黄总理在掌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期间，大力推动本地文化发展，支持华社活动，尤其是在宗乡总会倡议

创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时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此外，在他的领导下，文社青部在2013年推出文化捐献配对基金，为宗乡总会的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担任副总理期间，他多次出席华社活动，包括担任“春到河畔”的主宾，与宗乡总会理事进行“品粥聚会”等。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黄总理承诺，政府将持续支持提升国人的双语能力，培养更多“精华”，宗乡总会对此深感鼓舞。

蔡会长说：“明年新加坡将迎来建国60周年。回顾过去，我们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然面临通货膨胀、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挑战。我们坚信，在黄循财总理和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带领下，新加坡将会团结一心，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宗乡总会和所属会员团体，

也将积极传承华族与宗乡文化的精髓，促进多元文化的共融与发展，推动我国的多元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让国人作为新加坡人感到自豪。”

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也在致辞中表示，黄循财总理自2022年4月受委为第四代政府领导以来，积极推出良政，并取得许多政绩，包括“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推广华族文化传统，提升各族母语教育，缓解通胀和生活成本压力，打造亲商环境、亲家庭环境等。黄总理就任半年期间，频密官访了马来西亚、汶莱、老挝、印尼和泰国等多个区域国家，还远赴秘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以及到巴西出席G20峰会，魄力非凡。看到总理不懈努力，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为国家的未来发展铺路，他鼓励本地企业应继续开阔格局和视野，不因为外部环境动荡而退缩，勇敢取得突破和创造新成绩。

高会长说：“今天世界局势变化莫测，地缘政治充满不稳定性。新加坡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是充满挑战的。今天这个‘精诚携手·共拓新程’晚宴就代表了华社、华商的诚意与信心，我们非常愿意与期望付出华社的全力，与政府团结一致，开拓新加坡的新里程。华社与华商愿与政府一道努力，塑造一个人人都能拥有成就、归属感，百花齐放的新加坡。”

互信合作 共面挑战

黄循财总理以英文致开场白，随后又以华语发表了近10分钟的演讲。他肯定了华社在新加坡发展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表示，从政25年来，他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担任总理，责任变得更大，庆幸的是，过去的政治领袖为新加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社



黄循财总理（左六）与蔡其生会长（左五）、高泉庆会长（左七）、黄山忠主席（右七）、吴绍均主席（左四）、李奕贤主席（右五）、傅海燕部长（右六）、以及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在晚宴上共同合唱《一起走到》

区之间互相信任，彼此尊重。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也是华社领袖们多年来努力的结果。他也感谢华社领袖对华社的贡献，感谢他们一直与政府密切合作，加强社会凝聚力，传承新加坡华族文化，还帮助商家企业，推动经济发展。

黄总理说，政府与华社有这么好的合作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都重视教育，提倡社会和谐和多元种族主义，放眼未来。因为有共同的理念，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政府和华社有一样的心愿，就是希望国家繁荣，



在蔡其生会长（左）和高泉庆会长（右）的陪同下，黄总理（中）获赠新加坡年轻陶艺家潘施颖女士创作的《太阳、月亮和雀》陶艺作品



黄循财总理（前排左七）、傅海燕部长（前排左五）和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蔡天宝（前排右五）、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前排左六）、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前排右六），以及宗乡总会理事、各华社机构代表和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合影

社会稳定，大家同心协力，一起为更好的未来努力。他也承诺他和他的团队会与华社携手同行，共同进退，继续秉持共同的价值观，加强合作关系，为世代代的新加坡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凝聚共识 一起走到

两个主办机构也精心为黄循财总理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名为《太阳、月亮和雀》的陶艺作品由本地年轻陶艺家潘施颖制作。作品上面有本地糕点的浮雕，还有鲜艳的雀和花朵，反映了新加坡人互助团结的共同经历、优良的价值观念和独特的美食文化。

活动到了尾声，黄循财总理还与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兼主管贸易关系事务部长傅海燕、蔡其生会长、高泉庆会长、华族文化中心主席

吴绍均、华助会信托局主席黄山忠、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以及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一起上台合唱了孙燕姿的歌曲《一起走到》，为晚宴画上圆满的句点。（欢迎晚宴次日，黄循财总理在其面簿上肯定华社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具体内容见封底）

题图说明：

敬酒仪式。从左至右依次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任吴绍均、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兼主管贸易关系事务部长傅海燕、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主席黄山忠、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黄总理（左九）与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交流并合影

逃离

文·陈雨婷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房间的地板上，勾勒出斑驳的光影。我睁开双眼，脑海却留下了一丝模糊，心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仿佛昨夜做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梦。梦里有什么我想抓住的东西，又好像记不清是什么了，又或者别的什么。你知道的，有时人是分不清脑子里的东西到底是梦境，还是发生过的事情。打开窗帘，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这个待了许久的城市，又开始泛起了陌生。内心的空洞愈发强烈。

我不想再想了。我需要换个地方。梳理了头发，行李装上需要的东西，一个人悄悄上了火车，很快便走在另一座城市的街头。来到一家小酒店，办好手续，进入房间。酒店的房间虽然陌生，但是，在这片城市中却能让我觉得被安抚。我轻轻关上门，沉浸在一丝安宁之中。我靠在床上，打开书本，却分神了，不知不觉间，又躺了很久。

夜幕降临，房间内的光线渐渐黯淡下去。我慢慢站起身来，打开房门，迈出了酒店的门口，漫步在熟悉的街头。路过那家曾经光顾的咖啡馆，远远的，我停下脚步，透过玻璃窗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加快了脚步，不知道心中在期待些什么。推开咖啡馆的门，走到我们曾经坐过的位置，坐下来。

“记得吗？”我轻声说：“那次我们在这里，你不小心把咖啡洒了一身。”

“哈哈，当然记得。”你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畔：“那是我最尴尬的一次。”

“还有那次，外面下着大雨，我们躲在这个角落里，喝着热咖啡，听着雨声。”你想起另一回。

“记得。”我笑了笑。

“有时候我还在想，如果当时的雨停不下来，我们会不会就一直呆在这里？”

“或许吧。”我回答道。

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雨真的在下，仿佛时间停止了一般。

站在咖啡馆门口，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过去的点点滴滴又回到脑海最隐蔽的一角。

已经过去了两年，自从你离开的那天起。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表露过我内心深处的想念。我努力维持着生活的正常运转，仿佛你从未离开过一样，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每一天，我都按部就班地过着。我起床、工作、吃饭、睡觉，一切都按照规律进行，没有丝毫的偏离。我告诉自己，生活必须继续，即使内心空荡荡的感觉时常袭来，我也要强迫自己保持镇定。

我好像习惯了总是保持着微笑。夜深人静，当我独自一人时，那些被封存的情感却趁机涌上心头。我在黑暗中默默地思念着，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有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地坐着，打开手机，浏览与你曾经的聊天记录。读一条一条信息，听一条一条留言，这样仿佛能让我感受到你就在身边一样。

然而，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了。夜深人静时，你的影子却又悄然闯入我的思绪。

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个我们相识的地方。街道上的灯光投下斑驳的影子，仿佛是你在我送行。

林高评语：

题目是逃离，而行动却正好相反——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我和你相识的地方，又勾起一段段思念。情不自禁时更绘声绘影，重现两人的一次对话，这个细节真把思念提到眼前来触摸得到。小说的叙述是跟着我的思绪走的，我借助于笔下的款款倾诉以纾解心中的抑郁。最后一个疑是真却是幻的送行画面，更是余味无穷。

何曾念此

作者·孙志伟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
年，可是还是像发
生在眼前；事情就
像发生在眼前，可
是恍如曾经置身另
一个世界。

第一天

我与食物彼此打量对方，它们是这一天里仅有的访客。

第二天

在静止的空间感知世界，是站在窗前召唤阳光，是盯住猫眼翻找时间，还是用大脑配合窗外的声响，描绘车辆飞驰的瞬间……

第三天

时间的流逝是一种日常。

在一个快餐、快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大行其道的今天，此刻，我与同样在世界各个角落等待时光流逝的人们，是否在以面壁静思的方式来完成一种修行？

如果我们所有的审慎，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种种的不可预知，那么我们此刻的“墨守”是否是为了更好地恢复这世间应有的秩序——一种我们曾经一再习以为常，如今却已经有些陌生的“常态”。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试图自我镇静的开头，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当下，和一个居于其间动荡、混乱与迷茫交织的岁月。

世间的路我们走了许多，但没有多少会像这样如此步调一致。

庆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走了出来，但仍有不少人依然在恢复秩序的道路上且阻且行。

第四天

窗户上结起了水珠，水珠一粒粒很像教科书上岩土的剖面。水珠越向上越小，细密、难以分辨；越向下越大，像一层层堆砌的卵石。

卵石一般分布在各个静止空间的人们，勾勒出一幅群像——在这幅群像里，有突兀的高楼、空旷的街道；有忙碌的居家办公者、焦虑的求职者；有等待电脑、等待上课的孩子们；有奔波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有被长堤分隔两岸的家人们；有因各自国门紧闭无法相见的亲人们，也有我们

一再留恋的逝者……

人们的影像彼此叠加，勾勒出一段特殊历史，和一幕幕令人唏嘘的现实。

第五天

人类的繁荣从没有像20世纪后半页到21世纪初这几十年里如此令人瞩目：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饥饿与贫困在被消减，自然资源被广泛利用，各种创新工具与发明不断出现并日益普及，互联网和快速低廉的出行方式正让地球的各个角落成为比邻的村落……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得主胡森锐才（Hossein Rezaei）博士指出，我们今天世界的面貌可以看作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从石器时代的第一个工具，到后来的蒸汽机、化石能源的发电厂、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它们都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界食物链的束缚，并由此获得支配其它物种的能力，但这种支配力却使得人类愈发盲目自大、愈发觉得自己就是这“房间里唯一的主人”。只是当那些已知的、有形的世界逐渐被掌控和征服之后，人们才发现，面对细菌和病毒这种细微的生命形式，自己竟然还一直如此手足无措。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记载了不少细菌、病毒与人类的纠缠：比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腺鼠疫），这场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大瘟疫在1346-1352年间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生命；还有一战结束时造成2100万人死亡的流感（该数字实际可能会达到4000万），在这场持续了52个月的大流行病中，全球受感染人数达到5亿（当时世界人口一共才17亿）。

戴蒙教授指出，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体，并使我们的生病，由此造成的流行病有这样的特点：受感染者很快会将病毒传染给近距离接触者，从而

造成大面积的感染；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或是死去、或是康复。

这一幕，如今我们已经是相当熟悉。

而2003年爆发的SARS似乎更能带给我们一些鲜活的记忆，那种来自死亡的近距离问候，那种对社会安全感和既有认知的挑战，更像是如今Covid-19大流行的预演——只是无论从袭扰世界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还是从克服疾病所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当下更像是一场“世界大战”，这种震撼人心的威慑力是无论多少场“预演”也无法企及的。

哲学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洛勒旁先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让一位不愿接受临终圣礼的老人在离世前忏悔。教士们问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位先生只是淡淡地说：“我并没有说服他什么，只是让他感到了恐惧。”

是的，这一次，恐惧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曾言说的记忆。

第六天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好了很多——不再忐忑现有的医疗资源能否应对大量潜在群体病患和一再涌现的输入病例；生活不再会被各种突然而至的消息弄得有些零乱，每日所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离家不远处的超市里；就连疫苗这个期盼已久的远水，也在努力解决着一度迫在眉睫的近渴……

作家阎连科提醒人们：“经此一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在这场全世界各个角落都一步步陷入困境的灾难中，人们发现，文明与进步并不是永恒的主题，相反，“荒谬与倒错”倒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一场完全陌生的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尚无法找到满分的政治人物，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或多或少都曾做过误判：有的行动迟缓，有的行为过度；有的痛定思痛、知耻后勇；有的一再辗转腾挪，最终也难逃信任危机的宿命……

第七天

时间自有其固有的叙述方式——平和、简淡、始终如一；离去时，不受任何人驱使；再度轮回后，也不会有多一秒的同情。

在这场危机中，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福柯所倡导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论得到了验证。福柯发现，18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不再像古老的权力那样致力于“使人死”（通过展示死亡、公开处决的方式获取力量）；而是致力于“使人活”（主张为生命负责、扶植生命）。这两种权力是现代政治得以存在的内在动力。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并非单一的权力形式，而是诉诸两极：一是针对个体的规训权力，如对肉体的矫正、训练与提高（学校、兵营与工厂都是规训权力的典型）；二是针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它试图控制的是整体人口中的一系列概率事件（如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宏观调节），这一权力的形式正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

在这场危机中，医疗救治权被空前地注入到政府权力中，人们在生命健康与安全有了真切的感知之余，也感受到复杂且不断变化中的公共权力对自己的影响。人们的行动一再受到限制，人们的生活一再受到影响。

但这场危机还是改变了不少我们的既有认知。比如，政府不再是那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全知者”，而是需要我们不断予以配合，需要容忍它犯错、改正，并不断调整以适应各种全新挑战的危机应对者与人民意愿的执行人。政府可以拥有强有力的社会管理和支配权，但这种权力仍然是以增进和保障人民的福祉为宗，当旧的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挑战，政府应当立刻与人民对话并做出改变。

第八天

这大概又是新的一周吧。

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早上，人们应该还无暇顾及是否真有所谓的“蓝色忧郁”，而是早早出发、抵达各自的工作场所。

忙碌的日子还是一如往昔。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了保持社交距离、接受了居家办公、熟悉了各种算不上繁琐但又不可轻易遗漏的申报；孩子们习惯了坐在电脑屏幕前，虚拟如同真实般的（或是真实如同虚拟般的）与老师、同学畅谈；我们要不停戴上和摘下口罩，不断要让自己呼出的气息能够触碰到那绵软

的迎面之“壁”；我们与好友相见，既要保持亲热，又保持距离，或者为了彼此的健康可以选择暂时不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身边有人再也见不到了，也有不少人身体还依然硬朗……

第九天

我们的未来会怎样，众多科幻电影中的情节或许可以成为某种示范。像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机器公敌》中所描绘的那样，在2035年，地球上每五人就拥有一台智能机器人，机器人快递员、机器人女佣无处不在；也可能是像反乌托邦电影《时间规划局》所展示的那样，人类可以凭科技的力量永葆青春，但社会财富却被按时间重新分配，富人长命百岁，穷人会因时间余额不足而暴毙街头……

疫情之下，科技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远程办公与交流、在线订购和非现金支付正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从日常的奔波与往复之中解脱出来，但也将人们抛入到另一张更大的“网”中。

此刻，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处于哪个社会阶层，具有何种知识和记忆，各种与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数码平台已经将我们个人身份从过去的“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逐渐转变为“数字人”（digital person）。当人们从日渐从实体化的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进入到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里，一片新的“海洋”正展现在人们面前。

由实体变为数码，由现实变为虚拟，当我们高尚的目标、肤浅的享乐、我们困惑的境遇和期盼的生活也一同置身在这片数字汪洋里，我们自己是否还是一叶自由的扁舟，抑或是被另一个巨大的欲望之网牢牢控制的待捕之鱼？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也逐渐开始习惯生活在各种虚拟的世界里。虚拟世界里发生的各种事件在对现实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面对可能会遭人滥用的科技、各种会被有意或无意盗取的大数据以及越来越超乎既定规范和想象的人工智能，人类面对这股正在崛起中的新势力，是否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

第十天

灰蒙蒙的天终于放晴，我看见了对面楼上自

己的影子。

暖暖的看着这片金色世界，连恼人的车辆轰鸣也像是在完成某项特殊使命。

遥想阻断期间，载货的罗厘车成为新加坡空旷快速路上的主角。这些昔日因噪声和身躯笨重而令人有些生厌的家伙不断往返长堤，进出码头、机场，为我们带来每日所需，将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

从那时起，每当看到这些行驶中的大家伙，我就像是看到了一片行走的绿地一样看到了生机。我知道，只要有这样行走风景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命线还将得以延续。

我们身边的生命线自然也少不了巴刹和小贩中心，它们就像是从黑白电影中走出来的甘榜父子，淳朴腼腆、始终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他们在阻断期间维系着国人的日常所需，也成为维系我们生活信心的基石。

在未来，我们的就业与生活会与各种科技和创新更加密不可分。然而，生活里也缺少不了那些看似简单却始终默默承载我们传统与日常的老朋友。他们或许会因缺乏某种现代气息而被人忽略，但他们那种简单却始终积极向上的气质恰恰可以将生活的本质融入到我们赖以依存的环境里，成为我们社会基因的一部分。

第十一天

在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下，与寂寞和读书相伴，可以和自我构成一个难得的“铁三角”：寂寞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存在；读书的时候，又能打消这种疑虑。每一天，便是在这看似自我怀疑却又不断坚持的矛盾里往复重生着。

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开创了一种全新叙事，他在《英国人民简史》中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宫中用餐时，突然飞进宫殿来的一只麻雀，这时宫中炉火熊熊，外面却是雨雪霏霏。那只麻雀穿过一道门飞进来，在明亮温暖的炉火边稍停片刻，然后又向另一道门飞去，消失在它所来的严冬的黑暗里。”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也正是如此？我们从严冬里走来，又消失在另一片更加广袤的未知里。

第十二天

不知不觉一段旅程已经快要抵达终点。

那仿佛只有一瞬间，又好像始终延宕在两道光明之间的狭长隧道里。

无论我们怎样去描绘它，或是赋予其何种深刻意义，它都只会停留在人们各自不同的记忆里，成为一道或轻浅、或沉重的烙印。

第十三天

已经陆陆续续地写下了这些，如果不是特殊的机缘，一个真实的自我何曾会与这些特殊的感知相遇；如果不是一段特殊岁月，人们又会何尝会在念及当下之余，让往事与未来一同聚在心头。

木心先生曾劝诫人们认真感受“从前慢”的日子，可我们总是习惯于匆忙向前；“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过去”，只是连这等诗意也早已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立即行动的告诫、不甘人后的惶恐以及对劳而无功的焦虑。

如果现实是一只盛满愿望的杯子，一直满载前行的我们，又何曾会顾及到杯子以外的乾坤与生态？

第十四天

整理好行李。

向着独自生活的时空做最后的致意。

在这本应一片灰暗的领地，此刻似乎留有几分特殊的光明。

人类既熟悉又陌生的真实感知也许同这光明一样，可能会一再遗失，也可能再度相逢。

愿我们与一切修好，愿我们再见、但并不再见！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人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联络人：谭瑞荣 电话：6354 4078 电邮：ruihong@sfcca.sg

目标一致

共建美好家园

非常感谢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昨晚联办的欢迎晚宴。我很高兴能与许多老朋友相聚。

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华社功不可没。多年来，华社为社会作出贡献，不仅传承宝贵的华族文化，鼓励国人多讲华语，也推动本地企业的发展。

华社所做出的努力，不是只顾眼前，而是也考虑未来，让每一代过得更好。

这和政府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会加强和华社的合作关系，集思广益，以新思维、新点子，克服挑战，携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

——黄循财

